

近代新型都市知識櫥窗： 晚清外交使節香港見聞錄分析

范棋歲*

摘要

1875 年，清帝國首次派遣正式駐外公使，一般來說，外交使團在前往歐美途中通常會在香港停留數日，並記載親身之見聞。在此之前，晚清知識份子學習西學常透過翻譯之書籍等管道間接獲得，有學者形容其為一種虛擬的、可自由汲取內容的「知識倉庫」，而香港具有中西文化交匯、不受清廷干預之政治環境，及對周邊輸出西方文化等獨特性，這些特點正給予晚清外交使節刺激，在他們的著作中可發現不少相關的觀察，而當香港的事物被外交使節記述成書，便又為「知識倉庫」增添了新的收藏。

本文以 1875—1900 年間晚清駐外使節之日記或遊記為材料，檢視其中與香港相關之記載，通過分析其內容呈現相關歷史背景以及東西文化差異對出訪使節之影響。同時也能發現隨著自強運動之開展，對西方事物了解加深，使節之見聞內容也將隨之變化；此外，在使節見聞可以發現內容上有前後傳承之情形，足以證明晚清使節通過見聞之記載與閱讀，建構了以香港為中心之文化傳播網絡，而晚清使節們對香港之關注，也突顯了香港這個近代東亞新型自由貿易港市所具有之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香港、晚清外交使節、文化傳播、知識倉庫、西學

投稿日期：2019/01/31；接受日期：2019/09/24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The knowledge display windows of new type modern city: analysis of the diaries and travel notes of late Qing Diplomatic Envoys in Hong Kong

Chi-Wei Fan^{*}

Abstract

In 1875, the Qing Empire dispatched a diplomatic envoy for the first time. Generally speaking, diplomatic corps usually stay in Hong Kong for a few days on their way to Europe or United States and record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Prior to this,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learned Western knowledge often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books and other pipeline indirectly, some scholars described it as a virtual "stock of knowledge", where people can extractable content freely. And Hong Kong has some uniqueness: a converg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would not be interfered by the Qing Empire, and exported the Western culture to the periphery area, these characteristics stimulated the mind of the late Qing diplomatic envoys. Many relevant observa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ir works, and when things in Hong Kong were described by diplomatic envoys, it had also added some new collection to the "stock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uses the diaries or travel notes of the diplomatic envoy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1875 to 1900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By exa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contents related to Hong Kong in these works, it presents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diplomatic envoys from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it w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affairs of people, therefore,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envoys in Hong Kong would change accordingly. Furthermore, in the case of the envoy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ontent of observations about Hong Kong be passed down. This is enough to prove that a cultural transmission network centered on Hong Kong things, be constructed by the late Qing diplomatic envoys through recorded and read the diaries or travel notes in Hong Kong. And the attention of the late Qing diplomatic envoys to Hong Kong also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of Hong Kong - a new type free trade port city in modern East Asia.

Keyword: Hong Kong, the diplomatic envoy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ultural transmission, stock of knowledge, western knowledge

Submitted: 2019/01/31 ; **Accepted:** 2019/09/24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壹、前言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國挾著船堅炮利的優勢，迫使清廷不得不中止長久閉關自守的政策，開放通商，並將香港島割讓為英國殖民地。對清廷來說，來自海上西方強權的衝擊，是前所未見的，更有人形容為「古今一大變局」，¹但對因此出現在世界歷史舞台的香港而言，卻是與中國踏上不同發展道路的開始。

香港擁有天然良港，加上位處海運交通要道，成為西方傳教士與商人前往中國與東北亞的必經之地，西方文化隨之傳入，與來自鄰近中國地區輸入之文化及香港原有的傳統底蘊交融，形成香港獨特的中西交匯文化氛圍。在晚清，長久以來天朝上國的迷思被列強叩關打破，時值危急存亡之秋，不少清末有識之士亟思圖存救亡之道，香港中西兼具的文化環境給予其極大的刺激，成為他們認識西方、了解世界局勢的重要窗口，其中也有部分知識份子著作中留下對香港的觀察。

這些知識份子中，存在一個有別於一般知識份子的群體，他們具有官員身份，故其對香港的所見所聞與記述能直達中樞，與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士人相比，在朝堂上能見度更高，也較具影響力，這個特殊的族群，乃是晚清出訪外邦之外交使節。清同治五年(1866)後，清廷開始派出外交使節，使團乘船前往外邦途經香港時，常會在此停留數日，外交使節與隨行屬吏往往也在此期間登岸拜訪，並記述相關見聞，在這些記載中，可以呈現出部分當時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情況，也可以通過使團成員的拜訪行程，如與港英政府官員的交遊往返，來了解香港的人文風貌。

然而在出訪使節的旅途記述中，香港又有何值得關注之處？這或許應從香港本身的獨特性談起。香港的獨特性，除了前述具有中西文化匯聚的文化環境外，亦具備政治環境的獨特性。在出訪使節前往外邦途中，香港實是其造訪的第一個由外國政府管治的都市，這個城市在地緣上與中國鄰近，社會組成也以華人為主，在經濟、文化等層面無可避免的受到中國影響，但政治上，港英殖民統治排除了清政府的大部分干預，故香港政治局勢相對穩定，在言論、出版等方面也得以比晚清中國擁有更多自由，形成鄰近中國，卻與中國有極大區別的特殊場域。

另一方面，香港擁有文化輸出的獨特性。具體來說，香港作為英國在中國沿海的首個殖民據點，塑造了東亞新型態的、近代自由海港城市的模式，包括免除關稅的自由貿易模式、都市設計、海港規劃、政法體制、科學技術、社會文化、公共建設等西方制度與知識，或是山頂纜車、電力、煤氣、電話等現代化建設，香港在東亞地區皆常居領先地位，並成為周邊國家或地區效法之範本，晚清中國亦不例外。在 19 世紀中葉後，以香港為重要樞紐，輸出西方文化與知識，通過直接與間接的、連動式的文化擴散，影響東亞地區，建構了香港對東亞世界文化傳播的網絡。²

¹ 徐繼畲，《瀛寰志略·凡例》，道光三十年刊本(臺北：華文書局，1968)，頁 20。

² 在文化人類學中，「文化傳播」意指一種文化元素由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或多個社會的轉移或互動，而在傳播過程中，接受之一方通常需經過評價、選擇、調整等過程才能將外來文化納入自身文化體系中，是造成文化變遷的重要動因。參見陳國強主編，《文化人類學辭典》(臺北：恩楷出版社，2002)，頁 128。

在香港這個有著多元獨特性的城市，遭逢具有官員身份的晚清知識份子，會產生怎麼樣的記述內容？實令人好奇而耐人尋味。則身處在香港這個中西交匯又日新月異的國際港市，晚清出洋使節有哪些觀察？而面對西力的衝擊，接受西學程度不同，但同樣受傳統儒家思想訓練的外交使節們，會有甚麼樣的回應？通過他們對香港之觀察，又產生甚麼樣的影響？都是筆者通過本文想要了解的問題。

過去不少前輩學者已對晚清赴外使節派遣進行研究，如汪榮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以郭嵩燾之生平貫串道、同、咸、光之近代史，其中郭氏奉命出使，卻因思想敏銳之程度超越時賢，提倡變革卻遭遇保守派反對而屢遭挫折的歷程，便是該書描繪的重點；³另如鍾叔河在《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及《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序論集》等著作中對斌椿、郭嵩燾、劉錫鴻、張德彝、薛福成等赴外使節之經歷、外交事業、思想皆有深刻之探討；⁴此外沈雲龍的《近代外交人物論評》、⁵李恩涵的《外交家曾紀澤：1839-1890》，⁶都有個別或是專門的對郭嵩燾、曾紀澤等重要外交官員進行評述。而尹德翔的《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一書則以「使西日記」作為研究之主要材料，探討在日記或遊記中所反映的西方文化對赴外使節產生之衝擊及對其思想之影響；⁷王艷秋及楊紀國的《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舉——1887 年海外遊歷使研究》除介紹晚清外交發展背景，主要聚焦於 1887 年清廷派遣海外遊歷使至各國考察各國情報此一事件來探討。⁸但這些研究更加關注使節們在歐美之見聞，本文所要探討之在香港見聞常未多所著墨。

而針對晚清使節之香港見聞，較具代表性的是周佳榮在其著作《閱讀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中介紹了晚清出訪使節斌椿及張德彝在香港之見聞，⁹以及在《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中分析了晚清使節對香港海防重要性的看法，¹⁰對晚清赴外使節在港見聞之研究成果是極富參考價值的，惟相關研究論述的篇幅皆較短，也仍未系統性且全面性的對晚清使節在香港之見聞進行分析，故本文之目的便是在過去既有研究之基礎上加以系統化及深化。

最後要指出的是，本文時間斷限將從光緒元年(1875)清廷首次派遣正式駐外使節開始，至 1900 年十九世紀結束為止。在這段時間內，廣義的香港版圖(港島、九龍、新界)已經形成，至 1900 年，除了甫租借不久的新界外，港島已高度都市化，九龍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能觀察到的應更為全面。對晚清中國而言，這段時間則是掙扎摸索著往近代化道路邁進的嘗試階段，姑

³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出版社，1993。

⁴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序論集》，長沙：岳麓書社，2002。

⁵ 沈雲龍，《近代外交人物論評》，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68。

⁶ 李恩涵，《外交家曾紀澤：1839-1890》，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⁷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⁸ 王艷秋、楊紀國，《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舉——1887 年海外遊歷使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⁹ 侯勵英、周佳榮等，《閱讀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香港：香港圖書教育公司，2007)，29-31。

¹⁰ 周佳榮，《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

不論其成敗，在實質上確已漸開拓知識份子的眼界，隨著對西方文化認識的加深，在不同時期赴港的外交使節，是否又會因此有不同的觀察與論述？這也是筆者欲討論的議題。

貳、晚清中西交流及前期外交遣使在港見聞之背景介紹

十五世紀開始，地理大發現吸引葡萄牙、西班牙等舊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前來東方建立殖民地，發展國際貿易，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者前來的，還有欲將天主教傳向東方的傳教士。從晚明到清初，西方傳教士或結識中國知識份子，或利用其專長奉職於宮廷，以達到其傳教的目的，同時也將西方知識傳入中國。這原本是一個讓中國與世界連接的好時機，但康熙年間的禮儀之爭，及耶穌會教士涉入康熙諸子奪嫡的鬥爭中，都導致天主教在華傳教受到限制，漸漸只被侷限在宮廷之中為皇室提供觀測天文、推算曆法、地理測量、繪製地圖，以及翻譯書籍等服務，但乾隆只喜好西洋玩物而非科學，嘉慶時傳教士地位更低，使傳教活動轉入地下。此後清廷雖在廣州繼續開放通商，但洋商被嚴格控管，且他們只為求利，沒有傳入西方知識的意願，加上清廷對「外夷」的鄙視心理，使相關情報被忽視，終造成清帝國長期缺乏對西方認識的惡果。¹¹

此種狀況一直到鴉片戰爭才被打破。工業革命後的英國以先進科技與武器戳破了清廷天朝上國的迷思，但清帝國畢竟是龐大且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群體，「開國」成為漫長而漸進的過程，最初只有少數的知識份子認知到需要重新認識西方，並私下翻譯書籍。¹²隨著通商口岸開放，傳教士在口岸建立傳教據點，他們開始翻譯一些西方書籍，終於對西學傳入中國開始有所增進，而清廷在二次鴉片戰爭後，推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也加速了對西方知識的翻譯與學習。

多種來源的翻譯書籍，為晚清知識份子建構了學習西學的「知識倉庫」，¹³而香港也是這個「知識倉庫」西學資訊的重要來源之一，通過「倉庫」他們可以通過閱讀獲取到西方的知識，並因此使西學在中國形成了文化傳播的過程，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此時期晚清知識份子對西學的認識，應都是通過翻譯等間接的方式來獲得，幾乎沒有親身接觸西方事物的經驗。

晚清知識份子親身前往異地接觸西方事物並記錄相關見聞，應至 1860 年代晚期才開始。究其原因，一般人民前往海外者雖不在少數，但絕大多數都是擔任契約華工，或是受雇於洋商的翻譯、買辦，將海外見聞撰寫成著作者極為少數；而在官方來說，則是受限於清廷對派遣使節持保守態度所致。依照《中英天津條約》的規定，中外雙方可互派使節，¹⁴但清廷卻始終沒有派遣使節赴外，因此對外國事務了解不深，反而是洋人越發熟悉中國內部情況。如此一來，清

¹¹ 于桂芬，《西風東漸——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44-6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頁 29-49。

¹² 于桂芬，《西風東漸——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頁 130。

¹³ 「知識倉庫」為中研院近史所潘光哲研究員所提出之概念，乃假設將晚清士人之閱讀對象視為一座包羅萬象且時刻處於建設而永無完工之日的倉庫，知識份子可隨其求知面向自由進出倉庫，或從中汲取所需知識，又或者著書立說，或纂輯益世，或為利之所趨，使一部又一部的書籍流通於文化市場中，為整體思想界的概念變遷提供動力來源；參見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臺北：2005），頁 137-170。

¹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54。

廷未能知己知彼，若長此以往，在國際外交上必然處於劣勢，但清廷並非有意阻擋遣使赴外，而是如《籌辦夷務始末》同治五年的記載：「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惟思由中國特派使臣前赴各國，諸費周章，而禮節一層，尤難置議，是以遲遲未敢瀆請。」¹⁵包括參見禮節等問題，都費盡周折，使總理衙門大臣們裹足不前，遲遲無法派出使節。

這種困局在同治五年(1866)時出現轉機，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休假返英，他向清廷建議帶同數名同文館學生一同赴歐，以培養外交人才，此議得到總理衙門的讚同，因同文館學生粗通外文，且身份低微，較不涉及最擔心的禮儀問題，加上有赫德陪同，應不致有太大流弊，但有鑑於同文館學生尚年輕而無經驗，故「必須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資照料，而行抵該國以後，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經事，貽笑外邦」¹⁶

被挑選陪同前往的官員乃是斌椿，¹⁷而斌椿獲選的原因，在《籌辦夷務始末》的記載中指出，「茲查有前任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前年五月間，經總稅務司赫德延請辦理文案，並伊子筆帖式廣英襄辦，年餘以來，均尚妥洽，擬令臣衙門劄令該員及伊子筆帖式廣英，同該學生等與赫德前往……。」¹⁸即是出於斌椿及其子內務府筆帖式廣英曾協助赫德辦理文案的淵源，由熟識的幾人配合，在溝通上應較無問題。此外，對首次派遣使節，總理衙門實際上仍不放心以漢人擔任，故斌椿旗人的身份能讓他更獲得信任，再加上斌椿不過是虛銜的七品知縣，地位不高，倘若出事影響也不致太大。¹⁹於是總理衙門選定斌椿率團赴歐考察，隨行的還有同文館學生張德彝等人，²⁰於同治五年(1866)農曆正月出發，歷時近 8 個月，遊歷歐洲 9 國。²¹自此，才為晚清知識份子親身前往異地並接觸西方事物，踏出第一步的嘗試。

在離開中國沿海時與返回中國前，使團皆曾停留香港，斌椿將他對香港之印象記載於《乘槎筆記》一書中，同行擔任翻譯的張德彝則著有《航海述奇》一書，其中也記載了在香港的見聞。使團自天津出發後，先於上海停留後，繼續往南航行，於農曆二月十一日抵達香港，斌椿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峰巒重疊如畫圖。入港，數十里樓房參差，依山傍麓，較上海又別有景象也。」²²斌椿所觀察到的香港，已有沿山建築之樓房綿延數十里，與當時已為國際大都會的

¹⁵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2)，卷 39，頁 1。

¹⁶ 同上註。

¹⁷ 斌椿(1804-?)，漢軍正白旗人，曾任山西襄陵縣知縣，因病辭職，後於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手下擔任文案，同治五年(1866)率同文館學生隨赫德出使，為晚清出使西方的第一人；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乘槎筆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 67-82。

¹⁸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39，頁 1-2。

¹⁹ 王豔秋、楊紀國，《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舉——1887 年海外遊歷使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9。

²⁰ 張德彝(1847-1918)，字在初，漢軍鑲黃旗人，清末外交家，遊記作家。原籍福建，出生於北京，同治元年(1862)考進同文館學習英文，曾八次陪同出使或擔任使節，造訪歐美日本等國，每次出國皆將相關經歷編寫成書，著有《航海述奇》等八部遊記，為晚清外交史研究重要史料；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航海述奇》(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 407-431。

²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29-230；王豔秋、楊紀國，《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舉——1887 年海外遊歷使研究》，頁 7-10。

²²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乘槎筆記》，頁 96。

上海各有千秋。使團在香港停留，更換船隻往南航行，並於午時登岸遊覽，斌椿對香港的印象是：「街衢整潔，市肆多華人。」，²³但並未停留太久，同日下午三點，使團便搭船離開香港。

同行擔任翻譯的張德彝對香港有較多記述，他對於香港的印象是：「已初抵香港，住船，見群峰壁聳，番舶雲集，迤西一帶洋樓鱗比，彝等乘小舟登岸，見道途平闊，商戶整齊。」，眾多的商船、密集的洋樓、整齊的街道，都讓張德彝印象深刻。他也提到了一些他所聽聞的衛生及交通法規：「其地約不准行旅路傍便溺；車行甚疾，人須自避，若撞死在午前者，車主賠銀十兩並不償命，過午撞死者無論。」，此外也介紹了香港所用銅幣，和在街道上所望見的鐘樓：「現有英華銅錢，體小孔圓，上鑄香港一仙四字，並英文一行，譯即此意。復見正面一樓如塔，上懸一鐘，外則表面，按時交鐘。」，²⁴張氏所提及的鐘樓，有可能是興建於 1862 年，位於皇后大道中與畢打街交界之鐘樓，²⁵而關於硬幣，港英政府於 1863 年分別發行一毫、一仙、一文幣值硬幣，而有孔的幣值實為一文，有可能是張氏不熟悉誤解所致。²⁶

經過了數個月的歐洲遊歷後，同治五年(1866)農曆八月二十日，使團返回中國沿海，抵達香港，斌椿記載：「申刻始至香港，戌初(按：約晚間 19:00 左右)，岸上洋樓，燈如繁星，光照山麓，徹夜不息。」，²⁷張德彝的記述則是：「二十日丙子，晴，未刻，見西面群峰錯列，秀色盈眉，蓋已抵香港前之群山矣，酉初(按：約 17:00)入口停泊，兩岸燈燭輝煌，徹夜不息。」，²⁸與初次過港不同，兩人在回程時見識到香港如繁星輝煌的夜景，從中可以發現 1860 年代的香港已有相當程度的繁榮。

使團一行人在香港稍做修整後，乘船前往廣州，至九月初一，才再次返回香港，準備搭船北上。相較於出發時短暫遊覽，此次在香港停留較久，斌椿之記述如下：

初二日，往拜英國督理香港軍務馬公。

初三日，馬公招飲，肩輿繞山行十餘里，峰巒四合，圍如大環。

洋樓重疊，倒影清波，天然圖畫……。

初四日，舟因上貨，仍未開。入夜，樓屋明燈萬點，光照海濱。²⁹

此處斌椿所載「英國督理香港軍務馬公」，應即第六任港督麥當奴(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1814-1881)，斌椿作為清帝國之外交使節，由身為香港最高行政長官的港督接待飲宴，相當合理，而在赴宴途中，也可發現當時香港依照山嶺地勢環繞修建道路的情形。

在赫德、斌椿使團之後，清廷對派遣使團仍有諸多顧慮。雖然了解不派遣使節赴外會造成何種危害，但總理衙門認為，遣使赴外的難處有二：

²³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乘槎筆記》，頁 96。

²⁴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航海述奇》，頁 453。

²⁵ 黃棣才著，《圖說香港歷史建築：1841-1896》(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134。

²⁶ 侯勵英、周佳榮等，《閱讀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頁 30。

²⁷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乘槎筆記》，頁 140-141。

²⁸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航海述奇》，頁 591。

²⁹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乘槎筆記》，頁 141。

顧中國出使外國，其難有二，一則遠涉重洋，人多畏阻，水陸跋涉，寓館用度，費尤不貲，且分駐既多，籌款亦屬不易；一則語言文字，尚未通曉，仍需倚繙譯，未免為難，況為守兼優，才勘專對者，本難其選，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獲致狎而見侮，轉足貽羞域外，誤我事機，甚或勉強派遣，至如中行說之為患於漢，尤不可以不慮。³⁰

簡言之，即是經費與語言的困難，加上遣使外交涉及國家利益，德才兼備又精通外文之人才難求，都使總理衙門極為謹慎。赫德、斌椿使團只被視為參訪遊歷性質，往後不再仿照，而遣使之事則需要從長計議。³¹但意想不到的人選出現，再次提供了轉機。同治六年(1867)，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卸任，在任職公使期間，與清廷關係良好，他曾向清廷官員表示：「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³²即願意如同清廷派遣其為使節一般提供外交協助，而適逢蒲安臣任期屆滿，總理衙門建議聘請蒲安臣擔任赴外使節。

在獲准辦理後，其具體的施行方法，則是「派令試辦一年，凡於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於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遽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准，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儻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³³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蒲安臣仍須知會總理衙門，沒有專擅之權。同治七年(1868)農曆二月，使團正式出發，同行的官員有總理衙門記名海關道志剛、禮部郎中孫家谷等官員。使團首先穿越太平洋抵達美國，後又經大西洋航抵英國及法國、瑞典、丹麥、普魯士、俄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後循海路返回中國，³⁴在回程途中經過香港。

對此次的出訪，志剛著有《初使泰西記》，孫家穀則有《使西書略》一書記錄旅途見聞，但對於途經香港之記載都頗為簡略，僅有寥寥數語，無從了解他們眼中的香港樣貌，反而是再次到訪香港的張德彝，在其著作《歐美環遊記》中又留下對香港的觀察。志剛、孫家穀與張德彝在回程時雖都有途經香港，但實際上張德彝是中途脫離使團，先行返國。同治八年(1869)農曆六月十七日，張德彝在巴黎因墜馬受傷，無法繼續參與使團之行程，³⁵故於農曆七月二十八日自馬賽搭船返國，於農曆九月初十抵達香港：

初十日，戊寅，晴。卯初(按：約早上 5：00 左右)，遙見遠迎大小山峰無數，水色先藍後黃，甚平。已初抵香港，進口停泊，見四面樓房以及華洋舟艇增益於前，堪比金山(按：即三藩市)。³⁶

³⁰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50，頁 32。

³¹ 同上註，頁 32。

³²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51，頁 27。

³³ 同上註，頁 27-28。

³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30-231。

³⁵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歐美環遊記》(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 799。

³⁶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歐美環遊記》，頁 815。

此次造訪香港，對張德彝來說已是第三次，但與前兩次相比，遍歷歐美各國的他眼界已大有不同，而與前有所不同的還有香港，在張德彝眼中，香港的樓房、中外商船已比過去更為增益，其繁盛的程度甚至可與美國三藩市相比。但或許受限於肢體受傷，行動不便之故，張氏對於香港的記載僅有此一小段文字。

整體來說，與近似觀光性質的斌椿使團相比，此次出使首次執行了正式且平等的外交任務，總理衙門眾大臣們所希冀遣使赴外，以在外交上「知彼知己」的盼望，也總算有了開端，惟率領使團者乃自美國「借將」而來，稍嫌美中不足，也突顯了清帝國外交人才的缺乏。李鴻章(1823-1901)便認為：「此次權宜試辦，以開風氣之先，將來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籌久遠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國人充當。」³⁷外交使節涉及國家利益，若人才培訓得當，自然需以本國人擔任。但不久後出乎意料的局勢發展，迫使清帝國不得不再次以缺乏近代外交訓練的傳統官僚率領使團前往法國。

同治九年(1870)春夏之交，天津出現兒童失蹤事件，當地天主教仁慈堂又屢傳收養的幼童死亡，加上拐賣犯被捕後偽稱受天主堂指使，使與西洋教士相關之邪惡傳聞更加甚囂塵上，³⁸群情激憤，在六月底包圍天主堂。法國領事豐大業(H.V. Fontanier)為此面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1826-1893)，³⁹態度跋扈，並在回程途中槍擊誤傷天津知縣之家僕，被圍觀民眾毆斃。此事演變為極大的外交爭端，法國派遣軍艦前來，要求處死相關官員與參與民眾，最初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1811-1872)辦理，但曾氏實事求是，不欲與法國起釁的做法卻遭朝野非議。同年七月，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態度開始軟化，清廷則改派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辦理此案，李鴻章將相關官員及二十五名從犯處以流刑，二十五名主犯處決，提出賠償。⁴⁰除此之外，清廷擇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團赴法謝罪，⁴¹此時法國已無力東顧，故接受清廷處置。同治九年(1870)農曆十月，使團自上海出發，沿東南沿海而下，航行往麻六甲海峽前，於香港停留；同治十年(1872)使團返回中國，途中又再次停泊香港。在此次出使途中，崇厚似乎未留下甚麼記錄，而隨團擔任翻譯，並第四次遊歷香港的張德彝在其著作《三述奇》中，則又有對香港不同的記述。

同治九年(1870年)農曆十月二十七日，崇厚使團航抵香港，張德彝記載，「入口過九龍峪，

³⁷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55，頁 10-13。

³⁸ 鴉片戰爭後簽訂之《中法黃埔條約》，開放基督宗教在華教禁，傳教士可在口岸建設教堂，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更開放教士至中國內地遊歷傳教，以及購買田產與建設教堂，傳教士在傳教的同時，也從事孤兒院、救濟等慈善工作，對儒家思想與傳統仕紳的社會領導地位皆造成挑戰。又傳教士擁有治外法權，部分莠民藉信教作惡規避法律，造成社會觀感不佳；加上有心人士利用民眾對基督宗教的無知，散播傳教士「剖心挖眼」以製藥等傳聞，皆使基督宗教與民眾間的關係更加緊張，自 1860 年代後，教案迭起。參見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622-63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40-242。

³⁹ 崇厚(1826-1893)，字地山，滿州鑲黃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舉，會試不中，靠捐官得甘肅陝州知州，後歷任多地職務，咸豐十一年(1861 年)經恭親王舉薦為三口通商大臣，同治元年(1862 年)兼署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 年)因天津教案處理不當，出使法國謝罪，1878 年(光緒四年)出使俄國，擅自與俄簽訂《里瓦幾亞條約》，受彈劾入獄，後以捐助軍餉三十萬兩獲釋。光緒十九年(1893)於北京病逝。；參見 A. W. 恆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略》翻譯組譯，《清代名人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334-337。

⁴⁰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44。

⁴¹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78，頁 3。

山青水碧，船集如蟻。」，泊船收拾行李後，一行人上岸，入住英國人開設之旅館，「步至大鐘樓前路，西英人開設之香港店宿，店廣闊潔淨，樓高四層，一切陳設器皿與泰西同。」，以張德彝前往歐洲數次的經驗，認為旅館中陳設與西方完全相同。下午一點左右，使團前去拜會港督，港督派人前來護送，「有英國千總一員，黑面纏頭兵六名，佩劍舉槍以護，又有差役一名，巡街兵八名，往來攔阻行人」，所謂「黑面纏頭兵」，應即在香港服役的印籍錫克教士兵，而從派遣士兵開道護送來看，港英政府對清帝國外交官的到訪亦頗為重視；隔天十月二十八日，該天為禮拜日，張德彝記載了居港天主教及基督教徒驅車前往參加禮拜的街景，「是日為天主耶穌兩教禮拜之期，自晨至午，堂內鐘鳴四應，街市車馬往來疾馳如飛。」⁴²

十月二十九日，張德彝經皇后大道步行至中環市街遊覽，他所觀察到的狀況是「居廛皆市食品，屋宇整齊。」，之後往市街北面「新廣隆果局」購買果物，並記載了和店主互動之情況，「筐篚羅列，諸品俱全。買芋薺、波羅密各少許，探囊偶出當十錢一文，彼見甚愛，遂與之，彼欲不索果價，彝言贈之，彼喜謝，又欲還送板荔一包、橙柚四枚，彝辭而未納。」，回程則遊覽大丹利街、威靈頓街、大興隆街、德吉拉街一帶，「路途平淨，市廛繁列，皆係華、洋人開設者。」⁴³，市容整潔，且可發現頗為繁榮，有眾多華洋商號開設。

十月三十日，張氏記載早晨前往中環機利文新街之「義昌鋪」理髮情形，「所用一西洋刀，一福建刀，一長二寸五分寬六分，一長三寸，寬如韭葉，皆活骨柄，甚銛利。」⁴⁴之後則在街道信步而行，有頗多販賣鮮花之攤販，「有賣鮮花者羅列，晚香玉、雞冠花、金菊、玫瑰、紫龍蘇、鳳尾球等，乃買五色菊花與芙蓉各一握回寓供養瓶中，香透窗外。」，而張德彝也記錄了他所看到當地華人之裝扮，頗為簡陋，「本地男女多赤足，頭頂草帽」，張德彝則推測是因香港氣候炎熱與道路平坦所致。⁴⁵

使團赴法謝罪任務完成後，同治十年(1871)農曆十二月初九日返抵香港，在船上過夜。初十日，用過早餐後，張德彝受命前去拜會香港總督，「未遇，遂乘肩輿登山眺望，一路花木蔥蘢，紅綠芬芳」；到十一日，早晨乘小船登岸，「步至燕樂軒早餐，食品甚佳」，⁴⁶在香港「燕樂軒」用完早餐後，整理行裝返國。相較於前幾次到訪香港，此次張德彝對香港的記載篇幅較多，與前幾次不同的還有增加了在此剪髮、購買水果鮮花等生活經驗，以及對香港社會人文的觀察。

從上述 1860 年代派遣的幾次赴外使團出訪及回程途中，在香港停留並留下之相關見聞中不難看出，此時期之使團或屬於遊歷、考察性質，或屬於道歉之特殊性質，出使人員多未受過近代國際外交訓練，對西方事物仍瞭解不深，故見聞常集中於香港之景觀或人文風物等內容，其觀點之深刻度似仍不足，但香港具備中西文化交匯、政治環境特殊、文化輸出等獨特性，對鮮少接觸西方文化，並以儒家為思想根基的晚清使節而言，仍不啻是一種特殊的刺激。

⁴² (清)張德彝，《三述奇》，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合肥：黃山書社，2009)，頁 219。

⁴³ (清)張德彝，《三述奇》，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頁 219。

⁴⁴ 同上註。

⁴⁵ 同上註，頁 220。

⁴⁶ 同上註，頁 355-356。

參、1870 年代中晚期駐外使節途經香港之見聞

到了 1870 年代中期以後，清帝國遣使赴外的政策出現重要的轉折，而其原因除了清帝國對派遣駐外使節的準備漸趨完善外，發生在光緒元年(1875)的馬嘉禮事件，也成為促使正式公使駐外的一大推力。

一、光緒元年(1875)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及其隨員

19 世紀 20 年代，英國帝國主義觸角開始延伸至緬甸，至咸豐二年(1852)年，殖民勢力已大為擴張，隱然有威脅雲南之勢，並在雲南回變期間與叛軍首領杜文秀(1823-1872)有所接觸。同治十三年(1874)，英國自緬甸派遣一支探測隊以探測仰光至雲南之鐵路路線，並通知駐北京英國公使遣翻譯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 1846-1875)至滇緬邊境迎接，雲南巡撫岑毓英(1829-1889)⁴⁷早已不滿英人於回變期間暗助杜文秀，英人自緬入滇，更讓他心生警戒，故暗中唆使部屬阻擋探測隊前進，在衝突中馬嘉理遭槍殺，此即為馬嘉禮事件。這是一起嚴重外交事件，但時值英國捲入與俄國等國在鄂圖曼帝國之權力競逐，故無意擴大爭端，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出面斡旋，以中英雙方簽訂煙台條約，清廷答應遣使赴英謝罪而暫告一段落。⁴⁸

清廷以此次赴英道歉為契機，決定以道歉使團作為首任之駐外使節，由兵部右侍郎郭嵩燾(1818-1891)為正使，⁴⁹五品候補京堂劉錫鴻(生卒年不詳)為副使，⁵⁰隨團的還有擔任翻譯的張德彝，以及同樣負責翻譯工作的洋員馬格里(1833-1906)等人。⁵¹使團於光緒元年(1875)農曆十月自

⁴⁷ 岑毓英(1829-1889)，廣西西林人，先祖為壯族土司，因改土歸流失土司之位。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秀才，太平天國期間以團練鎮壓叛亂。咸豐五年(1855)雲南回變起，岑以回變期間平叛有功，出任雲南巡撫。後歷任貴州巡撫、福建巡撫等職。中法戰爭期間調任雲貴總督，光緒十一年(1885)獲封雲騎尉。後於光緒十五年(1889)去世；參見 A. W. 恆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 略》翻譯組譯，《清代名人傳略》，頁 359-365。

⁴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48-249。

⁴⁹ 郭嵩燾(1818-1891)，湖南湘陰人，清末學者、政治家、外交家。1847 中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因父母喪未就職。太平天國期間加入湘軍隨曾國藩作戰，並曾提出以釐金籌餉之概念。咸豐七年(1857)入京，任翰林院編修，次年入值上書房，咸豐九年(1859)派赴天津協助防禦英法聯軍，因與僧格林沁意見不合返鄉。後歷任蘇松糧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福建按察使等職。馬嘉禮案後奉命出任駐英、法公使，因遭到副手劉錫鴻與保守派官員攻訐，於清光緒四年(1878)被召回，返國後不敢入京，返回家鄉從事學術工作，後於光緒十七年(1891)去世；參見 A. W. 恆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略》翻譯組譯，《清代名人傳略》，頁 263-265。

⁵⁰ 劉錫鴻(生卒年不詳)，原籍廣東新會，為道光二十八年舉人，先後入張敬修、毛昶熙等人幕府，同治三年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延攬其加入團總局辦理團練剿匪。至光緒元年(1875)授光祿寺卿，隨郭嵩燾出使，但赴歐期間與郭意見不合，加上聯合保守派官員，對郭多有掣肘，劉改任德國公使，光緒四年(1878)被召回。返國後曾上疏力阻鐵路建設之議，並於光緒七年(1882)參劾李鴻章未果，反遭革職，此後卒於北京；參見汪肇鏞輯，《碑傳集三編》，第十七卷，(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991-1005。

⁵¹ 馬格里(1833-1906)，字清臣，原為英軍軍醫，二次鴉片戰爭隨軍來華，後加入常勝軍對太平天國作戰，獲李鴻章賞識，負責主持金陵機器局並督造火炮，光緒元年(1875)因火炮發射意外遭撤職。同年發生馬嘉里事件，郭嵩燾奉命前往英國謝罪並設立駐倫敦使館，獲李鴻章推薦擔任隨行翻譯官，對郭嵩燾外交工作提供許多協助，郭氏卸任後，馬格里轉任英使館參贊，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去職，隔年去世於英國。參見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頁 394-395。

上海出發，前往南洋途中曾到訪香港；使團駐歐至清光緒四年(1878)被召回，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返抵中國，回程途中也曾在香港停留，在郭嵩燾所著《使西紀程》、《倫敦與巴黎日記》等書，劉錫鴻之《英軺日記》，及張德彝之《隨使日記》等書中，皆可閱讀到使團對香港之見聞。而此處需指出的是，對去程途中在香港之見聞，郭、劉、張三人的記載訊息量皆相當多，但重疊的部分亦不少，故在此部分將不把原文全部列出，而只分別自三人記述中挑選重點來呈現他們所觀察到的香港。

光緒元年(1875)農曆十月二十一日，使團抵達香港，正使郭嵩燾記載其對香港之印象，別有感觸：「記同治癸亥(1863)由海道赴廣東巡撫之任，所見香港房屋僅及三分之一，十數年間街衢縱橫，樓閣相望，遂成一大都會。」，⁵²見證了香港日趨繁盛的演變。當天「香港總督鏗爾狄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以四人與來迎，偕劉副使、黎參贊及翻譯官乘坐所派十槳小船登岸。炮台聲炮十五，大列隊伍，作軍樂以迎。」，此處所謂「香港總督鏗爾狄」即第七任港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09-1883)，遣人接待郭嵩燾一行人至總督府，總督府中「文武官集者二十餘人，通名姓者……詢及學館，適其地大學館總教習斯爵爾得在坐，約陪同一遊。」⁵³此處提及的大學館，應即 1862 年由港英政府成立的中央書院，⁵⁴恰逢其總教習在座，引導使團參觀書院。張德彝記載了書院內部的陳設與上課情景：

樓高三層，生徒五百餘名，內華人四百數十名，西人數十名，學分五堂，華人課華文者三，西人課西文者一，西人課華文者一。每堂百名一師主之，堂分十列而空其前，每橫長案坐十餘人，以次向後層累而高，前則師正坐相對，亦有師中坐而左右共分五列者，使耳目所及不能遁飾。⁵⁵

可以發現入學者華人比例較高，班級的開設採中、西文兼具，課室的設計則有部分採用西方階梯教室的模式。關於課程的內容，郭嵩燾的記載如下：

凡分五堂：課中國《五經》、《四書》及時文三堂，課洋文一堂，洋人子弟課《五經》《四書》者一堂。每堂百人，一教習主之。……其課《五經》《四書》，皆有期限；而於詩文五日一課，謂之小課。猶曰此術藝之小者，五日一及之可也。⁵⁶

可以發現書院除了教授外文外，也著重傳統典籍的教學，而對書院的課程規劃，郭嵩燾則認為比中國為好：「其觀條整齊嚴肅，而所見宏遠，猶得古人陶養人才之遺意。中國師儒之失教，有愧多矣，為之慨然。」，⁵⁷但對書院學生的學習情況，郭嵩燾記載港督堅尼地的不同看法：

⁵²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146b。

⁵³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頁 146a-146b。

⁵⁴ 即今日香港皇仁書院，於 1894 年改為現名。

⁵⁵ (清)張德彝，《隨使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212a。

⁵⁶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頁 146b。

⁵⁷ 同上註。

語及學館規模之盛，(堅尼地)歎曰：「是皆貧人子弟，學習二三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謀生，所以能有成者少也。」⁵⁸

在郭嵩燾訪港時，官方已設立中央書院，用以培養親近殖民地政府的新一代華人菁英，此外也有不少教會設立的新式學校，其動機其實在於培養更多華人傳教士，以便融入中國社會傳教。但對部分入學的香港華人而言，他們至新式學校就讀並非想學有所成，而是為學習英文以利日後可以順利謀求洋行買辦等職位，故往往未完成學業便離開，郭嵩燾與堅尼地的對談正反映了此種現象。

郭嵩燾等人本欲在香港停留一日便啟程，但10月21日晚上卻發生意外：「有英商輪船入泊，直撞船艙，聲如震霆，壞後窗丈許。」⁵⁹因船尾受損需整修，故使團在香港多停留一日，並受堅尼地邀請前往參觀監獄設施。郭嵩燾描寫的監獄情景如下：

屋凡三層，罪犯重者在上層。下層一人一房，上層三人一房，禁錮者扃其門，每屋一區或自為一行，或相對兩行，皆設鐵柵，扃鑰之房設小木榻當中如人數，衾褥、氈毯、巾帶、盤盂畢具。日疊衾毯榻上，整齊如一，不如式者減其食。其所收繫有西洋人，有呂宋及印度人，通計三十餘名，中國至五百一十四人，別有罰款二百元至四五元不等。收繫久者五年、七年，少至五日，亦有禁錮終身者。辦法亦略分三等：有錮閉者，有久羈課以織氈毯者，有運石及鐵彈者。……其禁錮者，房設一鐵軸，令手運之，每日萬四千轉，有表為記，不如數者減其食。人日兩食，飯一盂，小魚四頭。收繫久者，肉食，飯亦精。別有女囚一處，皆人一房。⁶⁰

除了描述監獄的設施與布置外，可以發現犯人除了西洋人、呂宋及印度人外，以中國人最多，同時也關押女囚。此外大略介紹了刑罰方式、監獄伙食等內容。在監獄的受刑人每日需要進行梳麻若干斤兩、織氈毯、運石砧和鐵彈(或稱鐵丸)的刑罰，用以活動筋骨，劉錫鴻對刑罰進行方式有仔細的描寫：

鐵丸重約二十斤，度諸地，兩手拾而上之，與胸腹平，少頃複置度間，凡十起落即畢事。砧長約尺，厚廣約各六寸，是日尚未見其演試也。……在獄三年者，令織毯。禁錮終身者，運鐵軸，日一萬四千轉，皆司獄督課之。⁶¹

而他認為刑罰的用意是：「迨罪既得釋，而人不傷，技藝且成，可藉以圖餬口。」⁶²為犯人的未來著想，養成其技藝，隱含有教養的寓意。而張德彝也紀錄了其他的刑罰情形：

⁵⁸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頁146b。

⁵⁹ 同上註。

⁶⁰ 同上註。

⁶¹ (清)劉錫鴻，《英軺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161b。

⁶² 同上註。

法律極嚴，按時出入，各處皆循序而進，路狹亦魚貫而行，絕不紊亂。刑具有鎖有鐐，以械手足，有繩鞭無板棍。其變詐反復敗壞風俗者，則刺其頸作黑圈，驅而逐之，不準(准)逗留香港。當日見女犯三十名，係犯拐帶偷竊案者，男犯有一名刺圈被逐，又一名業經被逐以刀削其圈塗之以膏，仍來香港，因瘡愈成斑，復經巡捕查獲，執而囚之。又一名係搶奪幼女者，受五十繩鞭，皮裂肉爛，癰血盈背，其在院中者排列成行，站立整齊，舉手加額為禮。其禁錮室中者，在外揚聲喝之，皆當門而立垂手向外，規矩森嚴。⁶³

可以看到當時香港對罪犯施以頸部紋上黑圈後驅逐出境以及鞭刑等刑罰之情況。至於監獄的飲食與生活環境，張德彝有比郭、劉兩人較多的描述：

華人睡木榻，五人一房，西人睡鐵牀，三人一房。食則華人各飯一盂、鹹魚四頭、茶一碗；西人各麵包一塊、牛肉一片、加非(按：即咖啡)一碗。……獄設禮拜堂，七日禮拜，囚人環立聽講。有病館以處病者，令醫士掌之。又有收斂病故人犯堂，洗滌精潔，以松香塗地，不獨無穢惡之氣，即人氣亦清淡。⁶⁴

華人與西人分開拘禁，日常伙食也依照華洋飲食習慣有所分別，另外重視基本人權，設置禮拜堂與醫院，並有專門收斂去世者的部門。根據以上郭嵩燾等三人的記載，可以發現他們對港英政府推行的獄政大致推崇，但從中其實可以發現幾個現象。首先，與殖民地政府開埠以來執行的華洋隔離政策相同，在監獄中華人與洋人是被分開監禁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堅尼地與郭嵩燾論及法律監獄制度時自認：「務在公平，無所歧視，此間監牢收繫各國人民之有罪者，亦一體視之。」⁶⁵但從張德彝所述「華人睡木榻，五人一房，西人睡鐵牀，三人一房」的規定來看，或許其中與華洋生活習慣差異有關，卻似乎仍隱然顯露出對華人的歧視之意。

在駐歐期間，郭嵩燾亦有對香港時事發表看法，光緒三年(1877)農曆十月初三日，郭嵩燾自報刊中閱讀到香港消息：

新理香港波伯亨里西專欲以寬仕民，不復夏楚(按：用刑之意)，而犯法者益眾，終至盜賊風行，於是乃許按司用刑。自云歷任各處，未嘗用刑，於此頗乖其意趣。

屬部尚書喀爾拉爾芬言，據各屬地文報，繫囚之多，無若香港者，何以至此？飭一報明其原因。

外部尚書德爾比咨，據波伯亨里西管理中國寓藉(籍)人民西洋裝束：住英國地界，歸英國管束；其歸中國，仍聽中國管束。

⁶³ (清)張德彝，《隨使日記》，頁 212b。

⁶⁴ (清)張德彝，《隨使日記》，頁 212b。

⁶⁵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頁 146b。

香港對過九龍嘴亦駐有小英官，有在九龍嘴外犯事者，鄉人執送小英官，轉送之香港。按西洋律法，非所屬地，不得科罪，乃縱遣之。至是其國家特詔，犯是在屬地外者，亦一律科罪。⁶⁶

此處所提到「波伯亨里西」，即第八任港督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 1834-1891)，但郭所謂之「不復夏楚」，其實與事實有所落差，軒尼詩是歷任港督中著名的人道主義及同情華人者，也的確曾下令停止公開鞭答的刑罰，並要求研究執行鞭刑的最佳方法，⁶⁷但並未廢除刑罰。而關於這些消息中提到香港治安敗壞，或是有罪犯在九龍半島附近犯案，被扭送香港後卻因治權問題遭縱放等現象，郭嵩燾認為問題之根源「皆由中國處理無法，以致一切無可籌商。」，⁶⁸即清廷在涉及香港問題上處理不當所致。

郭嵩燾在駐外使節職務解除被召回後，於光緒五年(1879)農曆正月二十一日自馬賽出發返國，二月二十九日返抵香港。二月三十日的行程是「因約伍秩庸、王子潛同至李逸樓處談。並偕子潛至東華醫院，為陳瑞南諸人所創建者，一依西法為之。收容病者百餘，延醫士八人，兼籌教習醫學。並至西洋學館及博物院一遊。」，⁶⁹此處提到的「伍秩庸」為香港首位出任立法局議員之伍廷芳，⁷⁰而「王子潛」即為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政論家王韜(1828-1897)，⁷¹「東華醫院」則是香港重要的慈善與華人社會領袖機構，⁷²「博物院」則應指香港舊大會堂中之博物館。

⁶⁶ 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4)，頁 358-359。

⁶⁷ Frank Welsh；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頁 297-298。

⁶⁸ 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359。

⁶⁹ 同上註，頁 964。

⁷⁰ 伍廷芳(1842-1922)是在香港華人社會中是接受過西式教育的新派菁英，他青少年時期就讀於聖保羅書院，之後曾於 1874 年赴英國攻讀法律，取得大律師之資格，在香港是第一個獲得此資格之華人；1878 年，伍廷芳獲頒太平紳士，而他也是香港華人社會中率先獲得此殊榮者；參見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香港：中華書局，2011)，頁 76-80。

⁷¹ 王韜(1828—1897)，蘇州人早年曾在上海墨海書館協助傳教士翻譯聖經等書籍，同治元年(1862)二月，太平軍佔領蘇州期間，他曾化名為黃畹向太平軍提出戰略建議，建議的內容卻被清軍查獲，王韜只好逃往香港。在香港他曾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後在 1867 年隨理雅各前往歐洲，使其眼界大開。1870 年返回香港，於 1873 年創設中華印務總局，並創辦《循環日報》，在報中宣揚其改革思想。王韜是晚清維新改革思想的先行者，當晚清自強運動仍大力推動「師夷長技以制夷」、停留在器物層面時，王韜便已注意到需從制度、文化等方面徹底改革，可謂居於改革思潮之先，他提倡引進西法、發展新式教育、建立現代化軍隊、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等方針，並提倡君主立憲，可說是開日後維新變法之先聲；參見同上註，頁 54-59。

⁷² 1870 年代時許多華人仍對西醫有所抗拒，生病時主要仍尋求中醫協助，故常有病重之華人病逝家中，或在供客死異鄉華人停屍之廣福義祠等待死亡的情形。但這樣的做法遭受輿論的攻擊，故在 1869 年禁止廣福義祠再收容死者。1869 年 5 月，第六任港督麥當奴(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1814-1881)向布政司提出設立中醫院的建議，專門為華人提供中醫治療，制定「華人醫院則例」(Chinese Hospital Incorporation Ordinance)。籌建醫院的資金來源，一方面來自有名華商的募捐，一方面則來自港英政府捐助的 115,000 元。1872 年，東華醫院正式開幕，設十二名總理，多由南北行、洋行等富裕之華商出任，總理之下另設協理，輔助總理處理公務，東華醫院的早期宗旨雖是為一般的貧苦大眾施醫贈藥，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但隨著醫院規模的擴大，華商影響力提升，也開始發揮其社會影響力，在港督軒尼詩有意協助下，東華醫院在實質上成為港英政府通過華人領袖管制華人的單位，為華人社會進行仲裁，同時替華人向港府爭取權益，並投入災難賑濟、社會救助、喪葬服務、興辦義學等社會慈善事業；參見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頁 167-171。

郭氏在博物館中所見：「而博物院則兼用粵人劉易之司之，鳥獸蟲魚金石物產之類咸備。所未見者海浮兩具，質如菌而形類深缸，容數斗。河豚甲數具，詢之劉易之，曰：『鰐』，蓋左思《吳都賦》所謂『鰐鮪』，即河豚也。左為博物院及藏書處，右為戲館，其上樓規模宏闊，尚未能陳設物事。」，⁷³描述博物院所收藏的展品以及其內部所設圖書館、戲劇院。在參觀完博物院之後，郭嵩燾受邀赴宴，在日記中記述了香港當地華籍豪商概況：「香港華人以李逸樓為首富，次魏姓，次郭姓，即所謂郭青山也。」而在宴會之後，「王子潛見贈《瀛壖雜誌》、《攷園尺牘》，陳瑞南見贈《東華醫院錄》。」。⁷⁴

整體來說，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劉等人在過境香港時，一方面受到港英政府的盛重接待，並對參觀學校、監獄等政府機構之見聞有詳盡的記述，另一方面則能看到郭嵩燾與改革思想家王韜及香港華人知識份子伍廷芳等人交遊，此外也可以發現香港華商在香港從事貿易，包括政策或金錢捐輸等需多方迎合殖民政府，⁷⁵但當有本國官員訪港時，這些富商接待應酬也是不遺餘力。

二、光緒四年(1878)駐英、法公使曾紀澤

清帝國在光緒元年雖首次派遣了駐外公使郭嵩燾與劉錫鴻，但波折甚多。郭嵩燾的風範與用心辦事之外交手腕頗受英、法外交官員好評，並將其途中所見寫成日記，對西方政教等制度頗為稱道，認為中國若要富強，必須了解西學之本末，但此舉卻遭受國內反對派大加撻伐，甚至認為其有貳心於英國，而作為副使的劉錫鴻更是處處針對他，多番向清廷密告誣陷，使郭嵩燾不堪其擾，頻生去意。至清光緒四年(1878)，清廷同時將郭、劉二人召回，由曾紀澤(1839-1890)繼任。⁷⁶

曾紀澤乃晚清重要外交家，為同治中興名臣曾國藩(1811-1872)之長子，自幼受傳統儒家教育，並工於詩文，成年後正逢自強運動開展，故略通西學與英文，並研究西方文化，有學識涵蓋中西的評價。他於光緒三年(1877)襲封父親一等毅勇侯之爵位，到光緒四年(1878)，曾紀澤由於通曉英文並對西方知識有所涉獵的背景，得以繼任駐英、法大臣的職務。⁷⁷曾紀澤使團於光緒四年(1878)農曆九月、十月先後在天津、上海進行準備，十月底正式出發，農曆十二月抵達巴黎。在曾紀澤的著作《出使英、法日記》中可閱讀到出使途中的見聞，其中便包括使團航行往東南亞前，於十一月初暫泊香港時的觀察，以及赴歐後對香港一些時事的評論。

⁷³ 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964。

⁷⁴ 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964。

⁷⁵ 舉例來說，晚清著名地理學家繆祐孫(1851-1894)於光緒十三年(1887)訪港時，適逢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金禧(50 年)紀念，繆氏觀察到香港華商為了討好港英政府，「諸華商輸錢興作，街衢間方擾擾，構綽楔架傑閣，張電燈，以帛纏柱，流蘇為簾，羅珠玉錦繡，召歌舞幻戲，雜以鼓樂，錦宵竟晝，踵事增華，所費約十餘萬金，其奢靡如此。」，香港華商為配合慶祝活動，大力投入金錢與人力資源，其迎合殖民政府的態度可見一斑。參見(清)繆祐孫，《俄遊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三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415a。

⁷⁶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69-270。

⁷⁷ A. W. 恆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略》翻譯組譯，《清代名人傳略》，頁 464-467。

光緒四年(1878)農曆十一月初二，曾紀澤使團抵達香港。當天申初(約 15:00)，「香港總督亨乃西，遣小火輪船來船相迎。到岸列隊聲炮，以八人與昇餘(余)至其署中，談甚久，意極殷勤，邀餘(余)挈眷入署小住，婉辭之。」，⁷⁸此處所指「香港總督亨乃西」，即為前文郭嵩燾曾提及的「波伯亨里西」，第八任港督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 1834-1891)，當時翻譯似仍未有定則，故在不同人之作品中會出現譯名不同的情形。軒尼詩邀請曾氏帶眷屬入住總督府，被曾婉拒，曾氏做為外交使節，似乎秉持「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的原則。該天入夜後，「仍入總督署，與亨公一談。入書室靜坐，亨公為餘(余)安排者也。……亨公請便飯，其夫人出見，同席。戌正(按：約 19:00)入坐，亥正(按：約 21:00)散，散坐一談。」，⁷⁹宴會結束後返船休息。

隔日為十一月初三，處理公事外，曾紀澤再次與軒尼詩會面，「因亨公昨日麵(面)言：將遣其夫人來船拜候內人。餘答以內人應先登岸拜候，惟中、西禮節不同，不能拜男賓，尤不能與男賓同宴。亨公亦自知之，遂約本日午初，仍遣舟、與迎內人登岸，餘(余)亦入其署中照應一切。餘與亨公談宴極久，內人在上房，有女仆能傳達語言，談宴亦盡歡。」，⁸⁰這段記載突顯了中西禮儀的差異，同時也表明了港督軒尼詩對中國禮俗的了解與尊重。

宴會進行到下午一點半左右，宴後曾紀澤與夫人遊覽大會堂中之博物院，畢後夫人先行回船，曾氏則又前往監獄參觀，「遍觀輕重罪犯監禁之處，作工之所。郭筠仙丈(按：即郭嵩燾)所記，無一字不符者。」，⁸¹曾氏所見監獄情形，與郭嵩燾所記完全相符。此後則「至總督署，徑就餘(余)室治事，不欲數驚主人也。」，晚間又赴軒尼詩之宴會，「亨公特設大宴，客二十餘人皆至，戌正入席，奏西樂以侑觴。亥正席散，複談良久。」。⁸²

十一月初四，簡單辦公並用餐後，曾紀澤出外遊覽登港島太平山，「峰高一百五十餘丈，乘山輿而登峰顛，有燈樓、電架等物，憑眺良久。山勢層疊甚遠，扼全粵之形勝，較大沽海口尤為雄闊，但無淺水處耳。」，⁸³記述了自山上遠眺之山海地理形勢，認為維多利亞港更勝大沽，而也可以發現通往太平山頂的纜車 1888 年才開通，此時仍靠山輿作為上下山交通工具。當天晚上則又至總督府赴宴，「至總督署赴席，仍係大宴，奏軍樂以娛賓。」⁸⁴

十一月初五，在香港盤桓數日後，曾紀澤準備出發赴歐，出發前「清檢應送亨總督之磁如意，暨內人贈其夫人之約指等件。登岸，至其署，與之一談。亨公將列隊奏樂聲炮以送餘(余)行，……與亨公同飯。飯後，小坐辭出，亨公自乘輿送至小輪舟而歸，遣其中軍巴爾門送餘(余)登大輪舟。」，⁸⁵從曾紀澤訪港數日之行程來看，港督軒尼詩可說對其到訪相當重視，除每日對談公事，為其安排晚宴並互相介紹夫人認識外，還出借總督府的房間供曾紀澤辦公使用，處處

⁷⁸ (清)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376a。

⁷⁹ 同上註。

⁸⁰ 同上註。

⁸¹ 同上註。

⁸² (清)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頁 376a。

⁸³ 同上註。

⁸⁴ 同上註，頁 376a-376b。

⁸⁵ 同上註，頁 376b。

禮遇，這一趟到訪可說是賓主盡歡。

在抵達歐洲赴任後，曾紀澤不時也關心香港之時事，如光緒五年(1879)三月廿六日的日記，便可看到他與隨團擔任翻譯的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對軒尼詩的施政進行討論，而在所有赴外使節的著作中，曾紀澤對軒尼詩的評論應是對港英政府官員最深入的描寫：

飯後，複至清臣(按：即馬格里)室久坐，談及刑亂國須用重典之理。香港民庶龐雜、奸宄逋逃，曆任總督皆治之以嚴。今總督亨乃西(軒尼詩)，自懲其曾仕數處，皆以嚴而召亂也，蒞香港乃改而從寬，笞撲日輕而牢獄益滿，英人上下咸毀之。又云，前總督於華人、英人一律看待，不存歧視之心，是以相安無事。亨乃西待華人較優，轉致華、英分為二黨，識者亦以是咎之。⁸⁶

如前所述，軒尼詩是香港開埠以來極具人道主義且對華人最為友善的港督，不僅下令變更笞刑施行方式，任命伍廷芳(1842-1922)擔任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⁸⁷同時加強東華醫院的職權，讓華人領袖更大程度上自行管理華人事務，等同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並在市政規劃上打破華洋隔離的設計，⁸⁸再再都使香港外籍人士對他感到不滿，也就是曾紀澤與馬格里所論「亨乃西待華人較優，轉致華、英分為二黨」的情形，但所謂「前總督於華人、英人一律看待，不存歧視之心，是以相安無事」，恐怕是不符實際情況的。

對馬格里所言，曾氏另外提出自己的見解，認為軒尼詩之所以不待見於在港外籍人士，或許與他信仰天主教，而非基督新教有關：「實則英國君臣皆崇耶穌教，亨乃西獨崇天主教，毀之者蓋自書院之教士始焉，一唱百和，瑕疵日聞，病根蓋在於是」，⁸⁹實際上，曾紀澤的想法亦不能說沒有其道理，而從中亦可發現曾氏對西方基督宗教的新舊教差別與衝突已頗有認識。

三、光緒四年(1878)駐美、日斯巴尼亞(西班牙)、秘魯公使陳蘭彬

相較於其他列強，美國在外交上對清帝國較為友善，且有眾多居美華僑，更有學生留美，故美國成為晚清派遣駐外使館的第三個國家，⁹⁰而派駐美國的首任正副公使陳蘭彬(1816-1895)，⁹¹以及容閔(1828-1912)，⁹²也正與經辦幼童赴美留學事務有密切之關聯。容閔早年就讀澳門、香

⁸⁶ (清)曾紀澤，《曾惠敏公(紀澤)使西日記·卷二》(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頁 19a。

⁸⁷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 100。

⁸⁸ 同上註，頁 105。

⁸⁹ (清)曾紀澤，《曾惠敏公(紀澤)使西日記·卷二》，頁 19a。

⁹⁰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70。

⁹¹ 陳蘭彬(1816-1895)，字荔秋，廣東吳川人。咸豐三年(1853)進士，同治八九年間曾協助直隸總督曾國藩經辦救荒賑濟。曾向曾國藩、李鴻章建議選派幼童赴美留學，後被薦舉率領幼童赴美，光緒元年(1875)被任命為出使美、日斯巴尼亞、秘國大臣，光緒四年(1878)正式啟行。因與副使容閔對赴美幼童教育問題始終存有歧見，使該計畫於光緒七年(1881)中止，返國後一度以左副督御史職任職總理衙門，後稱病退休；參見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197-199。

⁹² 容閔(1828-1912)，廣東香山縣人。早年就讀於澳門、香港之教會學校，後前赴美國留學，畢業於耶魯學院，咸豐五年(1855)返國，先後任職於香港與上海之政府部門與洋行。同治元年(1862)進入曾國藩幕府辦理洋務，後又轉入江蘇巡撫丁日昌幕府，曾通過丁向軍機大臣文祥提出強國建議，其中包含揀選學生出國留學，此議被採納，容閔被選為「幼童出洋肄業局」副委員，同治十一年(1872)率領第一

港之教會學校，後又赴美國留學，畢業於耶魯學院，以其知識養成背景而言，對西方可說非常了解。咸豐五年(1855)返國後，先後在香港、上海之政府機關與洋行任職；同治元年(1862)，至安徽省安慶入曾國藩幕府，協助購買機器以興辦江南機器製造局等洋務，後又擔任江蘇巡撫丁日昌(1823—1882)之幕僚，在此期間他曾通過丁日昌向軍機大臣文祥提出強國之建議，其中一條便是選派青年出國留學，此議得到曾國藩、丁日昌等人的助力，獲准辦理。而根據容閔於《西學東漸記》中所載，丁日昌欣賞容閔之才，亦深知他所提建議必遭受守舊派攻擊，為免容閔首當其衝，需尋找一名可與守舊派共事之官僚，此人便是陳蘭彬。⁹³

故當推動相關政策時，陳蘭彬與容閔被選為「幼童出洋肄業局」之正副委員，於同治十一年(1872)率領第一批留學幼童赴美，同治十二年(1873)，陳、容兩人受命前赴古巴調查當地華工遭虐待情況，此後陳蘭彬返國，容閔則長期續留美國。此後一直到光緒元年(1875)，陳、容二人才又被總理衙門任命為出使美國、日斯巴尼亞(西班牙)、秘魯等國欽差大臣，但正式啟行要等到光緒四年。⁹⁴光緒四年(1878)農曆五月，陳蘭彬與使團自上海出發前往香港，在香港預訂前往美國之輪船，之後由香港出發，經日本前往美國，關於此趟旅途見聞，容閔因身在美國故未有記錄，陳蘭彬則著有《使美紀略》，從中可見到往美國前於香港停留時的觀察。

光緒四年(1878)農曆五月初一日，陳蘭彬偕隨員自上海搭乘招商局輪船出發，初五日抵達香港，初七日，陳蘭彬「往拜英國駐港總督燕尼士。」，即拜會第八任港督軒尼詩，初八日則前去拜會駐港英軍司令 Francis Colborne(1817-1895)與輔政司等港英政府官員，當天陳蘭彬見識到先進的電話科技，大感神奇：

是日在輔政司署見傳話筒，該署距燕尼士避暑處約三里，以手搖筒旁銅拐，起號即對筒問話，畢，旋聞筒旁鐘響，以耳向筒，一一回答。詢其何以能然，據言電線能傳字即能傳聲，厥理甚明，而內中制度，未得窺悉也。⁹⁵

電話在 1860 年代已被發明，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1876 年於美國取得發明電話的專利權，郭嵩燾光緒三年(1877)擔任駐英公使時便曾體驗過電話的操作，⁹⁶香港也在同年

批留學幼童赴美，直至光緒八年(1881)年中止。此後容閔長居美國，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返國，後積極參與變法，變法失敗後避居上海租界，光緒二十六年(1900)又參與唐才常自立軍相關運動，失敗後容閔遭通緝，逃亡香港，光緒二十八年(1902)赴美，後病逝於美國；同上註，頁 195-196。

⁹³ 容閔，《西學東漸記》(臺北：廣文書局，1961)，頁 107。

⁹⁴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195-198。

⁹⁵ (清)陳蘭彬，《使美紀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二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57b。

⁹⁶ 郭嵩燾記載原文如下：「(光緒三年九月初十)近年卑爾(按：即貝爾)所製聲報，亦用電氣為之。上下樓由右引至左，相距約數十丈，安置電線，各設小木案以便憑坐。兩端為木杵圓柄，納電線其中，約長三寸許。上有圓盤，徑二寸許，凡兩層。內層縮小五寸許，上為圓孔，徑八寸。銜馬牙鐵餅其中，薄僅如竹萌之半。上下並貼薄錫，中安鐵柱，用電線環繞之。安置柄中，鐵餅距鐵柱中間不及一秒(秒)。據格裏(按：馬格裏)云：『人聲送入盤中，則鐵餅自動，聲微則一秒動至二百，聲愈重則動愈速，極之至一千，與耳中之膜納聲者同一機杵(杼)。聲在耳中，如錐刺之，則自知痛，痛不在錐也。鐵膜動，與耳中之膜遙相應，自然發聲。』然其理吾終不能明也。

令德、在初(按：即張德彝)居樓下，吾從樓上與相語，其語言多者亦多不能明。

問在初：『你聽聞乎？』曰：『聽聞。』

『你知覺乎？』曰：『知覺。』

(1877)引進電話，故陳蘭彬為先進科技感到驚奇的當下，電話技術雖未普及，但實已傳入香港一段時間，⁹⁷領先於東亞世界其他地區。同時，他也聽聞了有關留聲機的相關資訊：「又言英國已有人作藏話箱，數人分桶說話，封之，數萬里之遙，百十年之久，揭封側聽，口吻宛然。」他認為「於立約遺囑諸大端，尤為有用。」⁹⁸

肆、1880 年代後赴外使節對香港之觀察

進入 1880 年代，距離自強運動推動已近二十年，相較於過去，晚清知識份子對西學的認識與接受程度已有所不同，透過 1880 年代後出訪的外交使節在香港之見聞，以及他們所關注的議題，也可明顯發現這種變化。

一、光緒十二年(1886)出使英俄等國大臣劉瑞芬與隨員

光緒十一年(1885)，駐英、法、俄等國公使曾紀澤任滿，受命返國，由太常寺卿劉瑞芬繼任為出使英俄等國大臣，⁹⁹而此次出使隨行的則有由曾國荃引薦，晚清著名的地理學家鄒代鈞(1804-1908)，¹⁰⁰劉瑞芬與隨行使團於光緒十二年(1886)農曆二月自上海出發，循海路前赴歐洲，劉瑞芬與鄒代鈞分別將其前往英國途中，以及在歐洲之經歷，寫成《西轍記略》、《西征紀程》等兩本著作，而使團在航往南洋途中，曾於香港稍作停留，故可發現兩人在書中留下對香港的記述。劉瑞芬之記述如下：

抵香港，英總督派員迎迓如禮。蓋香港本一孤島，三面臨海，為兩粵門戶。咸豐十一年英國索去，視為重鎮，設立總督管理商務並交涉事宜，開山填海，慘澹經營，迄今數十年遂成繁庶，為西洋各國船舶入華一大關鍵。¹⁰¹

『請數數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惟此數者分明。而格裏與洋人相與談應如響，耳目聰明實亦有過人者。」

參見(清)郭嵩燾著；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326-327。

⁹⁷ 彭淑敏等著，《香港第一》(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50。

⁹⁸ (清)陳蘭彬，《使美紀略》，頁 57b。

⁹⁹ 劉瑞芬(1827-1892)，字芝田，安徽貴州人。太平天國期間以諸生身分入曾國藩幕府，同治元年(1862)轉入淮軍，入李鴻章幕府，辦理軍械事宜，並參與剿捻。後掌管松滬釐局，並歷任兩淮鹽運使、蘇松太道、江西按察使、布政使。光緒十一年(1885)授三品京堂，充任出使英俄等國大臣，並授太常寺卿，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出發，光緒十三年(1887)改任駐英、法、義、比四國大使，光緒十五年(1889)任滿返國，授廣州巡撫，光緒十八年(1892)卒於任內。參見馬昌華主編，《淮系人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頁 23-25。

¹⁰⁰ 鄒代鈞(1804-1908)，字甄伯，湖南新化人，晚清知名地理學家。其家族家學淵源，以繪製輿圖見長。在他二十餘歲時，曾獲同樣對繪製輿圖有深厚興趣的左宗棠(1812-1885)舉薦，擔任縣丞之職。光緒十一年(1885)時，清廷派遣太常寺卿劉瑞芬(1827-1892)為駐英、俄等國大臣，鄒代鈞以其輿地專長受推薦任隨員。光緒十七年(1891)，調任湖北，深受張之洞賞識。後支持維新變法，光緒二十七年(1901)任職京師大學堂，光緒三十四年(1908)病逝；參見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 72-79。

¹⁰¹ 劉瑞芬，《養雲山莊遺稿·卷八》，光緒十九年(1893)至二十二年(1896)刻本，頁 1。

他大致上介紹了香港成為殖民地的歷史，以及香港在港英政府經營下之繁榮景況，但不難發現劉瑞芬將「港島」與「九龍半島」，以及第一次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導致兩地割讓的時間點搞混，似乎對香港相關事務不甚熟悉。相較於劉瑞芬敘述錯誤，鄒代鈞則以其地理專長，在抵達香港前數日，便於日記中談論與香港有關之地理情況，包括「佛堂門」、「鯉魚門」、「紅香爐峰」、「維克多利亞」、「大嶼山」、「青衣壇島」、「急水門」、「南丫島」等香港地名皆可在他筆下看到，並分析香港周邊之水道地理及歷史掌故，可見其史地涵養之深厚。¹⁰²

鄒氏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市南倚山麓，隨山勢高低為屋，望之千門萬戶，上下層疊，繁盛殆亞上海。」，¹⁰³農曆二月十七日，鄒代鈞搭乘小舟登岸遊覽：

街路整潔，長衢夾巷相望，亦有華式坊肆錯列其間。尋登小埠，望峰巔有竿，所以表風向者。西人測峰，高於海面一千八百二十五英尺，為島最高處。北望尖沙咀，上有西人之房。咀之東角，有砌石為堤如方塘者數區，云英吉利製造輪船之塢也。¹⁰⁴

鄒氏對香港之街景與地理大致記述如上，但他真正關注的是涉及國家利權之事，如他以地理專長，分析九龍割讓之弊：

按九龍與香港間水道，實閩粵往來要路，一有阻梗，為害方甚。……香港雖入於英，而水道之利，我與英實共之。至九龍亦為英有，則片土之有無不足惜，水道之阻滯為可虞。¹⁰⁵

他指出九龍與香港間之水道是閩粵間的重要通道，一旦受阻危害極大，他甚至認為水道受阻的危害比領土割讓更加嚴重。另一方面，他也關注中、英貿易的商務情況與關稅問題：

光緒十年，商冊出口貨值英金一百又五萬二千三百又二鎊(每英金一鎊，約合庫平銀四兩)，進口貨值英金三百二十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鎊。兩相較，吾華歲出之貨多於歲入，為兩倍過之，商務凋敝，於此可見。泰西各國講求商務，免出口貨稅，唯恐其不輕；加進口貨稅，唯恐其不重，所以使土貨暢銷而防客貨之侵灌也。吾華或反術而行，豈收回利權之道哉。¹⁰⁶

鄒氏通過分析貿易紀錄，發現中國有嚴重的貿易逆差，而他認為主要的成因在於關稅政策，西方各國免出口稅而加重進口稅，增加土貨的銷量與市占率，中國必須仿效此種關稅政策，保護國內產業，才是收回利權之道。

¹⁰² (清)鄒代鈞，《西征紀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534b-536a。

¹⁰³ 同上註，頁 536a。

¹⁰⁴ 同上註。

¹⁰⁵ (清)鄒代鈞，《西征紀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頁 536a。

¹⁰⁶ 同上註，頁 536b。

二、光緒十六年(1890)英、法、義、比四國公使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清末官員與外交家。咸豐七年(1857)考取秀才，後因太平天國勢力擴張，被迫遷居江蘇寶應。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奉命剿捻時，出榜招賢，薛福成上萬言書，得曾國藩欣賞，進入其幕府供職八年，期間遊歷山東、南京、保定等地。光緒元年(1875)入李鴻章幕府，提供許多貢獻，因功於光緒十年(1884)授浙江寧紹台道。光緒十五年(1889)，任英、法、義、比四國公使的劉瑞芬任滿返國，薛福成受命前往接任，但因身體不適，到光緒十六年(1890)才出發。薛福成與隨員於光緒十六年(1890)農曆正月自上海乘船出發，於農曆二月十六日抵達巴黎，派駐歐洲至光緒二十年(1894)期滿，於該年農曆五月返抵上海。¹⁰⁷在南行前往新加坡途中，與返回上海之前，薛福成皆曾於香港停留，在其著作《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與《出使日記續刻》中除了可看到他遊歷香港的記述之外，薛氏在旅途中的其餘日記也曾論及對香港的看法。

光緒十六年(1890)農曆正月十四日，薛福成使團於戌正(約 19:00)抵達香港，薛福成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對香港的認識：

香港與九龍山對峙，山勢四面迴抱，極占形勝。英人以為絕好『哈勃』(按：harbor之音譯)，涎睨已久。『哈勃』者，譯言航海避風處也。道光壬寅年為英所據，初祇一荒島耳，周圍僅數十里；英人招徠墾闢，盡力經營，遂成巨埠。洋樓攢倚山嶺如蜂窩，有上環、中環、下環之名。其內大街名維多利亞，尤為貿易總匯。環貨駢集，閭閻雲連。居民凡十二萬人，船戶三萬人，總計十五萬人。內西洋人僅有三千，其餘皆華民也。又水陸操練兵三千，由英調來。¹⁰⁸

可以發現他對香港的自然景觀、街市設計和人口概況都有所留意，而對於香港鄰近中國，卻由港英政府統治的獨特政治環境，薛福成的想法是「香港為閩粵逋逃藪，雖與粵垣相距咫尺，而華洋隔絕，中國官不能拿問；必須設一領事官，嚴緝奸宄，保護商民，即合公法，最於中國公事有益，然前任使臣屢爭之不能得也。此事當相機待時而行之。」¹⁰⁹他希望能在香港設置領事，一方面避免中國罪犯利用地利之便逃往香港脫罪，一方面則可保護華民權益。

正月十五日，薛福成先遣翻譯登岸告知港督將前往拜訪，後於「午正二刻(按：約 11:30)」，英署以小火輪來迓。抵岸，英兵約七八十名排隊作樂為禮，礮臺聲礮十五，以轎迎余至署。余與總督傅衛廉相見，各道寒暄數語。傅君言：『仰慕已久，渴欲一見。』並言駐港二年，身體不甚舒暢，擬附下次法公司船回國養病。」¹¹⁰此處所提到「總督傅衛廉」，應即為第十任港督德輔(Sir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34-1909)，從記載中明顯可發現德輔似乎對香港有水土不服之情形。兩人見面寒暄之後，稍坐飲宴而散。之後薛福成在香港遊歷，據他記載「香港有學堂，

¹⁰⁷ A. W. 恆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略》翻譯組譯，《清代名人傳略》，頁 462-464。

¹⁰⁸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2a。

¹⁰⁹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頁 2b。

¹¹⁰ 同上註。

有監牢，郭筠仙侍郎已記文。又有兵房，有大花園，有博物院，隨員等皆往觀之。香港對面有船塢，似另建一小島上，蓋與九龍山相近。余欲往觀而未得暇，望見之焉。」¹¹¹薛氏參觀了學校、監獄、兵房、大花園、博物院等，有不少是郭嵩燾曾參觀過並記錄在日記中者，而薛福成透過親身遊歷以印證。

在離開香港之後，復經過新加坡，英國對殖民地的成功經營，使薛福成仍深思不已，在正月二十五的日記中可以觀察到他對英國人經營殖民地眼光宏遠，規劃周延之感嘆：

余與同人談及，昨所經之香港、新嘉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島也。洋人藉經營商務，闢荒島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於商務最精也。當締造之初，必審其地為水陸要衝，又有泊船避風之澳，有險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於是招致商民，創闢市廛。未幾，而街衢、橋梁、閘閘、園林無不畢具；又未幾，而電線、鐵路、礮臺、船塢無不畢具；寢至商稅之旺，民物之殷，輒與中國之上海、漢口相頡頏。¹¹²

不論香港或新加坡，都是英國人通過經營商務讓荒島變身國際性商港，其背後挑選地理位置並評估商業價值、都市規劃、建設招商等經營方式都是英國人所精通商務的一部分，故他進一步認為：

夫商為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則恃商為創國、造家、開物、成務之命脈，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蓋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為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而外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中國“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因思神農氏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齊太公勸女紅；管子正鹽筴而諸侯斂袂朝齊。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聖賢有用之者矣。蓋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閉關獨治，老死不相往來；若居今日地球萬國相通之世，雖聖人復生，豈能不以講求商務為汲汲哉！¹¹³

他指出中國傳統向來抑商，但西方人卻因重商而使國家發展，雖然「此其理為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上古時自可自給自足，但面對全新的世界局勢，即使是古聖人復生，「豈能不以講求商務為汲汲哉！」，亦即應一改過去抑商的思想，崇商重商，才能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

而在抵達歐洲後，也可在日記中看到薛福成對香港事務的掛念，尤其是香港地理與經貿地位的重要性，故在香港設置領事一點，讓他認為至關重要，如光緒十六年(1890)農曆八月十二日的日記：

¹¹¹ 同上註。

¹¹²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頁8a。

¹¹³ 同上註。

余查中國從前與各國訂立和約，但有彼在中國設領事之語，而無我在外洋設領事之文，蓋因未悉洋情，受彼欺朦。……曾惠敏公(按：曾紀澤)擬設香港領事，行文數次，英國外部以咨商藩部為辭，藩部以官民不便為說，管禿唇焦，終無成議。……而香港一區尤為中外往來咽喉，凡華洋各商貨物，均先至香港然後運轉各省。而交涉事務之緊要者，一曰逃犯，一曰走私，一曰海界。粵省每出巨案，派員至港，祇以未設領事，聲氣隔絕，動多扞格。所以粵東全省政務，往往為香港一隅所牽掣。此處添設領事，萬不可緩。……且日本、暹羅等國，皆已有領事在香港，而彼獨堅拒中國，本不公允。今但與之泛論通例，彼必無辭以難我。一經答允，則無論何處領事，惟我所派矣。¹¹⁴

他指出，香港為中外往來及華洋貨物必經之地，在港設領絕對有其必要，而主要牽涉之事務，「一曰逃犯，一曰走私，一曰海界。」，包括逃犯、走私等問題，皆因在香港沒有設領而難以解決，加上「且日本、暹羅等國，皆已有領事在香港」，獨拒中國並不合理，故薛福成通過使館參贊馬格里多方向英國政府爭取在香港設領，但由於香港太過鄰近中國，且居民又以華人為主，英國方面始終擔憂在香港開放清廷設置領事，其官方色彩極有可能會促使香港華人在眾多事務上轉而尋求領事的幫助，進而瓜分了殖民地政府的職能，對其施政產生掣肘，更甚者一旦設領，可能進一步凝聚香港華人的共識，助長對抗英國的勢力，提高失去香港這個殖民地的風險，故在經過多次談判後清廷在港設領一事最終仍遭否決。

另一方面，薛福成在駐歐期間，也沒有中斷對香港的認識，如光緒十六年(1890)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便可看到薛氏對香港各方面形勢的記述，首先他介紹了香港的政府架構：

英屬香港，洋人不及華民十分之一，然華民亦歸英官治理。英設總管一員，統屬文武，譯者遂以總督或以巡撫稱之。其副為輔政司，代行案牘，職如古之長史。次為庫務司，又次工務司，又次理刑司，次巡理廳、華民政務司，次總緝捕官，又有船務廳。¹¹⁵

其次他介紹了香港的稅制與稅金用途：

香港地價，每一畝值洋銀三四萬員(圓)至六七萬員(圓)不等，每畝歲收地稅數十員(圓)至百餘員(圓)不等。沿海各船，編列字號，每歲收稅十八員(圓)至十二員(圓)不等。此外有房屋稅、票稅，而鴉片煙稅極重。歲入之款，除津貼兵船外，其餘作本處公用，如官俸、巡役工食、修理街道衙署等費。¹¹⁶

稅種包括土地稅、船稅、房屋稅、票稅、鴉片稅等。其中鴉片採包稅制，即將鴉片販售權包售給特定包商，港英政府再將包稅銀歸為政府收入，根據統計資料，自 1876 年至 1886 年，政府

¹¹⁴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頁 1a-1b。

¹¹⁵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頁 5b。

¹¹⁶ 同上註。

因鴉片收入年平均為 173,000 元，自 1889 年至 1900 年，年平均收入更是增至 364,000 元，是港英政府重要財政來源，最高時曾達到香港政府年收入比例的 23.9%，¹¹⁷但因為稅金皆用於軍事及政府支出等公共用途，故他認為「故稅雖重而人樂輸」，是香港商業發展旺盛的原因。¹¹⁸

光緒二十年(1894)農曆五月二十四日，薛福成任滿自歐洲返抵香港，「寅正(按：約凌晨 3：00)抵香港口外停泊，以香港有疫氣，不進內港，亦不許人登船。」，¹¹⁹薛福成所記載的「香港有疫氣」，則是他恰遭逢了 1894 年香港所爆發的嚴重鼠疫疫情，¹²⁰因檢疫問題，防止疫病向外擴散，故船隻不進內港，也不讓人員登船。此嚴重的瘟疫起因於港英政府長期忽視香港華人住宅區的惡劣居住環境，致使其成為疫病的溫床，但從包括薛福成在內的眾多外交使節訪港見聞來看，一方面居港時間太短，一方面行程多由港英政府官方安排，故其實未能深入基層，對華人居住環境惡劣等問題也無從發現。

而從薛福成的記述可以發現，他對於香港的時勢有相當的了解，一方面對於英國政府以重商政策而將香港從荒島開發成國際港市多所推崇，並建議清帝國仿效，而另一方面他也亟欲爭取在香港設置領事，以解決走私、跨區犯罪等問題，為此即便在到達歐洲後，他也時時關注香港的情況。

伍、晚清使節途經香港見聞之文化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以自強運動的發展作為重要且觀察赴外使節見聞變化的時間軸，而在晚清面對西方勢力的進逼，中央、地方督撫及部分傳統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意識到必須做出改變，以圖求存，在這種共識下才催生了往近代化方向努力的自強運動，但諷刺的是，對追求變革的最大阻力之一並非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同樣具有傳統思想背景的士大夫及保守官僚集團。

自強運動固然加深了當時知識分子對西學的認識，且即便國力遜於西方國家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許多士大夫的心中根深蒂固的傳統「華夏」與「夷狄」之別，仍被當成抗拒西化變革的重要思想工具，作為絕大多數在儒家道統薰陶中成長的群體，要他們承認中國落後於西方「夷狄」，等同使其信仰崩毀，故形成了一種「貌似自尊實為自卑、害怕競爭害怕開放的性格」，¹²¹前述郭嵩燾受到副使劉錫鴻及其背後之保守勢力構陷，及李慈銘、何金壽等人之口誅筆伐，終致

¹¹⁷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2016)，頁 80。

¹¹⁸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頁 5b。

¹¹⁹ (清)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臺北：華文書局，1968)，頁 55。

¹²⁰ 1894 年，香港爆發嚴重的鼠疫，尤其以華人聚居的上環、太平山區一帶最為嚴重，短時間內便造成大量的病患死亡，民眾也因此恐慌，紛紛逃離香港。面對此嚴重的狀況，港英政府命令逐戶搜索病患與死者，將死者用石灰消毒後埋葬，病患則一律集中隔離，並將病患曾住過的房屋加以消毒。這樣的政策，卻引起華人社會的極大不滿，一方面來自華人長久以來對西醫的極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則是軍隊將民眾強制驅離再加以消毒，在華人眼中不啻是一種闖入民宅、侵犯隱私的行為，加上港英政府宣布香港為疫埠，禁止港人離開，雖無法禁止華人私自離開，但卻使華人社會與殖民政府產生一種緊張的關係。後因港英政府有鑑於人口流失、經濟蕭條，開放染病者返回中國，並將太平山區等重疫區之房屋群拆卸重建，才漸使此事告一段落；參見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 114-116。

¹²¹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頁 263-264。

使《使西紀程》被毀版，¹²²或可視為受此種性格影響之明證。

傳統思想入人之深，隸屬於士大夫群體的赴外使節在出使前或許也不可避免或多或少的受到此種性格影響，但作為赴外使節前往歐美途中首個由西方殖民政府統治的城市，香港特殊的環境則給予了他們思想與視野上的刺激。雖然也有像劉瑞芬這樣對港島與九龍半島及其割讓時序誤解的情況，但整體來說，在香港的見聞對使節們的影響是相當具體的。如郭嵩燾同治二年(1863)署理廣東巡撫時便曾對香港有初步接觸，當時他眼中的香港與出使時再次赴港相比，房屋密度僅約三分之一，但不過十數年間，便發展成「街衢縱橫，樓閣相望」的西洋一大都會，¹²³雖然沒有明言，但從郭嵩燾的敘述中仍可以想見，他對香港超乎其記憶之迅速發展的一種訝異情緒。

如果說郭氏對香港發展的訝異是隱隱然的呈現，薛福成途經香港後則是毫不掩飾的表達他對英國經營香港等殖民地高明手段之嘆服，在他看來，英國人通過評估地理環境，選擇水路要衝興建港口以及建立軍事防衛，再逐步興建房屋，並推動都市計畫、公共建設、招商等一系列的措施，將香港這個荒島經營成「寢至商稅之旺，民物之殷，輒與中國之上海、漢口相頡頏。」¹²⁴的巨埠，而這所有都可歸結於英國人所最擅長的「商務」之經營。更進一步的，在香港所見讓薛福成認為，雖然過去儒家經典都將商人排在四民之末，但實際上是有了商業經營的行為，才得以確保士、農、工各自的工作更加精進，這也正是西方國家得以發展富強之主因，薛福成因此提倡改抑商為重商，因處在全球各國相通的近代，只有重商才可與西方國家競爭，就算是聖人復生，「豈能不以講求商務為汲汲哉！」。¹²⁵同樣在香港受到商務刺激的還有鄒代鈞，對於中英嚴重貿易逆差的情況，他認為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中國應學習西方的關稅政策以保護國內產業，並收回利權，而免除關稅的自由港政策正是香港發展興盛的主因之一。

除了商務之外，如郭嵩燾、劉錫鴻、張德彝等人參觀中央書院，發現課程中西兼具，規劃及內涵似乎還勝過中國，深符古人培養人才之遺意，「中國師儒之失教，有愧多矣，為之慨然。」，¹²⁶因而產生慚愧且慨歎之複雜情緒；或如參觀監獄，對於嚴格管控、有條不紊的獄政，以及培養囚犯謀生技藝，及重視囚犯基本人權等情況都頗為稱道；另外像郭嵩燾參觀博物院的新奇收藏，¹²⁷或是陳蘭彬在香港見識到當時亞洲少有的先進電話科技，¹²⁸都為使節們帶來各種各樣的刺激。

以上所述種種見聞內容，不論是令人訝異的都市發展速度、對傳統抑商思想產生衝擊的商務經營與自由港制度、中西兼具的人才育成、嚴格與人道兼備的獄政，或是對新奇事物的接觸，

¹²²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頁 231；蕭國敏，〈《西洋雜誌》的編撰學：晚清士大夫首次走向西洋的集體敘述〉，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輯刊：第一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255-260。

¹²³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頁 146b。

¹²⁴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頁 8a。

¹²⁵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頁 8a。

¹²⁶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頁 146b。

¹²⁷ 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964。

¹²⁸ (清)陳蘭彬，《使美紀略》，頁 57b。

都是對使節們具體影響的展現。而在他們的記述中並不難發現，在使節們踏足香港時，這些影響都開始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所謂「貌似自尊實為自卑、害怕競爭害怕開放的性格」，同時也削弱了他們以傳統「華夷之防」思想所武裝之自信心。

另外，將赴外使節出訪的時間軸搭配自強運動推動的時間進程來看，其實不難發現，隨著時間軸推進，知識份子對西學認識的程度加深，在香港之見聞也會有所改變。1860年代，自強運動才剛開始推動，斌椿等人對西方文化仍認識不深，故其記述多流於表面，使他們印象深刻的往往是燦爛如繁星的夜景、整齊的街道、繁華的市集等香港風光，做為遊記的內容固然有趣，但實則缺乏值得參考的價值。

從1870年代中期，也是本文研究之重心，開始有所轉變，如郭嵩燾在閱讀香港新聞後，得出香港治安敗壞、治外法權問題等皆源於清帝國處理不當的結論，¹²⁹或如曾紀澤與馬格里討論港督軒尼詩招致洋人不滿之原因，¹³⁰都顯示1870年代的赴外使節在西學認識加深的情況下，開始關注更加具體的人文或政策層面之問題，了解也更加深入。到1880年代，自強運動對赴外使節產生的影響更加明顯，除了前述薛福成及鄒代鈞提倡重商主義及關稅保護政策外，¹³¹薛福成對香港作為中外貿易繁榮之地，牽涉到逃犯走私等問題堅持在香港設置領事之態度，都呈現了此時期的使節們在訪港時對時勢所產生更加明確的反思。¹³²

赴外使節對時勢的反思，總體上雖有隨著對西方的認識加深而有所進步，但仍明顯具有侷限性，從他們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因為出訪使節官方色彩太重，訪問期間多半會由港英政府安排行程，加上到訪時間通常較短，對香港的觀察無法深入基層，自然對一般華人惡劣的居住環境等問題無從了解，故讓晚清使節對香港的觀察產生限制而不全面；另一方面，他們仍多著重在收回利權等議題，尚無法跳脫自強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概念，對於尋求徹底從文化、制度面改革，甚至如何激發國人自信心與民族性等更深層的課題，似乎都還未有足夠的認識。

即便如此，從使節們的見聞中仍可以觀察到一些當時香港耐人尋味的人文社會現象。如即使在監獄中，具種族歧視的華洋隔離及差別待遇仍然存在。或如赴外使節如郭嵩燾赴港時，受到香港當地華商宴請款待。事實上，不少香港華商與華人社會領袖一方面配合殖民地政府，並追求其授予的太平紳士等榮譽勳銜，但另一方面則又向清廷捐官，甚至在香港出席重要場合時也身著清制官服以示隆重，¹³³呈現出在中、英兩國關係間因地制宜且身段柔軟的處世生存之道。

而在相關見聞中被提及，與赴外使節交遊往還的眾多人物中，必須指出的則是長年寓居於香港的王韜。郭嵩燾在訪港時曾與王韜見面晤談，並獲贈文集，¹³⁴但以王韜布衣之身，又非巨

¹²⁹ 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頁359。

¹³⁰ (清)曾紀澤，《曾惠敏公(紀澤)使西日記·卷二》，頁19a。

¹³¹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頁8a；(清)鄒代鈞，《西征紀程》，頁536b。

¹³²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頁1a-1b。

¹³³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11；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新北：左岸文化，2017)，頁184-185。

¹³⁴ 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頁964。

商富賈，甚至是曾向太平軍提出戰略建議而獲罪而逃至香港的敏感身分，為何郭嵩燾會不加避諱並特意提及？其原因可能在於王韜之特殊經歷。王氏曾協助傳教士翻譯經典，遊歷歐洲多國，且久居香港這個中外資訊交匯之地，並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言論環境創辦《循環日報》，撰寫社論評論時政，提倡改革思想。¹³⁵單就香港而言，他以久居香港之身，撰文對地價昂貴、華人居住環境惡劣等現象加以深刻的批判，便非短期停留而只觀察到香港片面情況的赴外使節可比，更不用說其對西方文化與世界局勢之掌握實遠勝當時大部分之知識份子，作為改革思想的倡議者，又是具備真才實學、名重一時的名士，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何在郭嵩燾的見聞中會特意對王韜記上一筆，在途經香港時通過與王韜晤談，了解他對時局的看法，或可得到一些自身觀察以外之見解，正是其原因所在。

此外，在部分赴外使節的觀察中提到社會經濟之內容，如薛福成曾提及香港的稅目，鴉片稅的繁重在前文已提過，而關於地價與土地稅，薛氏有較明確的記載：「香港地價，每一畝值洋銀三、四萬員(圓)至六、七萬員(圓)不等，每畝歲收地稅數十員(圓)至百餘員(圓)不等。」¹³⁶通過這段記述，我們當然可以說從中了解到香港當時地價與稅款之高，但這些金額看似不少，在當時的香港社會這些「鉅款」實際上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概念？或許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從其他的統計資料側面來理解這些款項的規模。在 19 世紀的香港，擔任苦力等底層工作之人口比例平均約達 62%，¹³⁷可說是社會構成的主體。而依照薛氏描述，香港的地價每一畝要價三、四萬圓至六、七萬圓不等，土地稅的話則是每數十圓至百餘圓不等，若參照香港史家 G. B. Endacott 的 *A History of Hong Kong* 一書，其中曾引用港英政府 19 世紀末的統計資料：一名苦力工人每月薪資只有 7 到 8 元，無固定工作之苦力每月甚至只有 2.5 元的薪資，¹³⁸兩相對照下則我們可以了解，地價動輒每畝三、四萬到六、七萬，對每月薪資只有 7 到 8 元，甚至只有 2.5 元的一般市民來說，可說是天文數字，每年每畝數十到百餘圓的地價稅，也都是一筆不易負擔的數目，而從此我們也相對能實際理解當時香港地價之高昂及稅收的繁重程度。

最後，有關香港在東亞地區做為文化傳播樞紐這件事，是沒有疑義的，但究竟文化傳播通過何種方式展開？通過晚清使節觀察香港並留下見聞一事，或可略窺一二，並了解香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晚清的赴外使團，從赫德、斌椿開始，總理衙門便有明文讓其記載途中見聞：「……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映證。」¹³⁹，到光緒三年(1877)，更有〈出使各國大臣應隨時咨送日記等件片〉奏摺的呈送：

……是出使一事，凡有關係交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使臣當詳細記載，隨時咨報，數年以後，各國事機，中國人員可以洞悉，即辦理一切，似不至漫無把握。臣等查外洋各國虛實，一切惟出使者親歷其地，始能筆之於書，……辦

¹³⁵ 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頁 54-59。

¹³⁶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頁 5b。

¹³⁷ 張麗，〈20 世紀早期香港華人的職業構成及生活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195。

¹³⁸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52.

¹³⁹ (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39，頁 2。

理此等事件，自當盡心竭力，以期有益於國……務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仍按月匯成一冊，咨送臣衙門備案查核。¹⁴⁰

從中可以了解總理衙門對赴外使節記載見聞的重視，以及如前所述，相較於一般出洋者之記載，使節之觀察在獲取情報、推動洋務等方面更具備重要參考價值及影響力。雖然赴外使節日記匯報制度因為程序化與雷同化的問題，以及因為派遣留學生等收集西方情報的管道日增而逐漸廢弛，是否認真記錄似乎也端看個別使節的態度，¹⁴¹但使節記載見聞，再將情報匯報給總署的模式是確實存在的。以此為基礎，回歸到使節紀錄香港見聞這件事，或許可以說這個行為本身即形成了一種文化傳播的架構：留下見聞的外交使節是記述者，香港與其蕴含的事物是被記述者，而閱讀了相關見聞的讀者則是接收者，通過記述、被記述與閱讀的模式，形成了文化的傳播。

再連結到前述「知識倉庫」的概念，本文中所列出的每一個赴外使節在將他們的見聞撰寫成書的同時，其實也是為「知識倉庫」增添了新的共同知識，而從「知識倉庫」中汲取新知的晚清知識份子，也可能成為新的記述者，這個論點在以下的這個例子也可以明確的得到證明：如郭嵩燾在訪港時曾參觀學校、監獄以及博物院等政府機構，並將其記錄在著作《使西紀程》中；在郭氏之後出訪的曾紀澤參觀完監獄後記述，「遍觀輕重罪犯監禁之處，作工之所。郭筠仙丈所記，無一字不符者。」¹⁴²而更晚出訪的薛福成則在參觀完學校與監獄後留下「香港有學堂，有監牢，郭筠仙侍郎已記文」的文字，¹⁴³很明顯，雖然因政治因素導致《使西紀程》遭毀版，但曾紀澤與薛福成確實都曾閱讀過該著作，並吸收了郭氏所記述對香港的觀察，在閱讀《使西紀程》的當下他們是從「知識倉庫」中繼承了新知的接收者，而當兩人到訪香港並親身印證郭嵩燾記述無誤的同時，又成為了為「知識倉庫」累積新知的記述者。

因此，雖然在曾紀澤與薛福成之外沒有類似的記述，但基於總理衙門使節日記匯報制度運作的前題，可以推測閱讀相關見聞的讀者，他們或許是後繼的出訪使節，又或者是更多的知識份子，都可通過歷任外交使節在「知識倉庫」中所不斷累積，包括免除關稅的自由港、都市計畫與經營、政法體制、社會文化及在東亞居領先地位的現代化建設等對香港之見聞，增進對香港的認識，進而形成了將標誌著新型態現代海港城市文化的香港之新知傳遞給晚清知識份子的文化傳播過程。

陸、結論

清帝國於東亞之領導地位在鴉片戰爭中受到挑戰，被迫接受條約體制等西方文明體系，但受限於過保守謹慎等因素，這條路途曲折而被動。晚清早期知識份子通過翻譯書籍間接了解西

¹⁴⁰ (清)席裕福、沈師徐輯，《皇朝政典類纂》，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92 輯第 917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頁 11214。

¹⁴¹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6-37。

¹⁴² (清)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頁 376a。

¹⁴³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頁 2b。

方，而香港正是他們了解西方的重要窗口之一。1860年代中期後，清廷才首次派遣了赴外使節，這是晚清知識份子首次親歷異地接觸西方事物並留下見聞，但他們同時也是外交官員，這表示他們的見聞的可見度更高，也更受重視。

香港作為具備著中西文化交匯、政治及文化輸出等獨特性的國際港市，又是旅途中首個西方殖民地都市，即便是在早期非正式性質的使團，使團中的知識份子在香港也明顯感受到文化的差異。基本上，本文所探討之晚清使節出訪的時間斷限，與自強運動推動的時間有極大重疊，故隨著自強運動進行的時程，可以發現出訪使節因對西學認識加深而在記述上有所改變。較早期的出使見聞在景物、人文等較表面的議題比例仍不少；中後期的使節見聞，則表面的記述漸減，對時勢反思等較深層而實際的問題，在使節們的記述中逐漸增加。

而因出使官員官方色彩較為明顯，訪港時幾乎皆會由港英政府正式的接待，故在記述中常能看到和港督等港英政府官員應酬往來的內容，如軒尼詩接待曾紀澤；或是對政府機構的參觀，如郭嵩燾、劉錫鴻等人參觀學校與監獄。也因此一方面可以從記述中看到港英政府官員的樣貌，一方面則可看到出訪使節對港英政府官員的人物評價，如曾紀澤與馬格里對軒尼詩的討論。

使節們之記述內容也有相當的廣泛度，有不少對社會人文、經濟貿易方面的觀察。更重要的是，受到在港西方資訊的刺激，讓出使的官員進而對國內情勢產生反思，如薛福成對港英政府市政規劃眼光之宏遠，及行政效率之速加以讚許，或是鄒代鈞提出應實施關稅保護政策以收回利權的想法，都展現知識份子的憂國之思；在郭嵩燾的記述中也可以認識到，十九世紀末葉的華商經濟實力已相當雄厚，連帶使其經濟社會地位提升，而郭氏與香港華籍富商及改革派思想家王韜交遊往還的場面，也可側面了解香港華人之生活樣態，而對東華醫院的記述更能發現華人領袖在商業取得發展之餘，也開始取代傳統仕紳，在社會發揮其影響力的一面。但整體來說，郭嵩燾等人記載監獄中華洋隔離的情形，可以知道華人仍然是受到歧視的。

但從出訪使節的記述中，也可以發現他們自身的侷限性。一方面如前所述，出訪使節們官方色彩太重，故在行程上都由港英政府安排居多，另一方面到訪時間往往太短，故常有走馬看花不夠深入，或是記述較流於表面的情形。如他們的記述中常對香港多有讚揚，但其實對香港社會基層情況所知不多，也未廣泛接觸香港居民，故對華人住宅區的惡劣衛生環境，甚至造成鼠疫等問題，便無從發現並了解。且到十九世紀末，自強運動已推動三十餘年，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宗旨註定讓大部分知識份子認定的「西化」停留在器物層面，如薛福成、鄒代鈞等人雖有不少對時勢之反思，他們所關注者卻還是停留在收回利權、發展重商主義等較屬於經濟利益層面的想法，實際上仍未超越「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範疇，對於從制度面改革，及塑造國族認同、凝聚人心等上較高層次的認識，還是缺乏的。

即便如此，在郭嵩燾與曾紀澤、薛福成等使節對香港見聞的例子，可以發現晚清出訪使節對香港的觀察，在被紀錄與閱讀的過程中，形成了將香港為中心，將近代自由海港城市之概念往外擴散的文化傳播網絡，種種與香港相關的事物，極有可能都通過文化傳播的網絡被更廣泛地介紹給晚清知識份子。在19世紀，香港應仍是不少西方新事物傳至東亞的最前沿，同時也是在東亞地區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各國商人競相前往逐利的國際貿易港。以前者來說，如當時亞

洲地區率先引進之電話，讓見識者嘖嘖稱奇，香港可說是當時亞洲地區邁向都市現代化之引領潮流者；而自由貿易港市的經營模式，也是常被留意的內容，如關稅保護制度，或是英國將香港從荒島經營為國際港市之手法，讓薛福成提出應一改過去抑商的想法，發展商業以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故雖然晚清使節們對香港的認識猶如走馬看花，通過記錄見聞，卻也彷彿是將當時東亞最先進之新事物、知識與概念陳列於架上的百貨櫥窗一般，或許流於表面，接收的程度也或深或淺，但他們確實將這些資訊傳達給了閱讀相關著作的讀者。

而在最後，更進一步連結到在前言中曾討論的議題，「在外交使節到訪的眾多城市中，香港又有何值得關注之處？」，香港除了具備前述中西文化交匯、政治環境以及文化輸出的獨特性之外，真正的關鍵點在於香港的統治者為來自英國的殖民者，被統治者的主體則是與清帝國臣民相同的廣大華人社會。赴外使節在歐美所見西方政法制度、社會文化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但以西法西學施行在洋人為主的歐美國家並不出奇，重點是歐美國家的文化、制度若移植到中國，是否適宜？若相同的文化或制度能在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施行得當，才能夠代表西學是適用於中國的，故以西法西學施行於華人社會且取得具體成果的香港，或許才正是晚清出訪官員投以關注且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之所在。

參考文獻

史料

- (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2。
- (清)汪肇鏞輯，《碑傳集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清)席裕福、沈師徐輯，《皇朝政典類纂》，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2輯第91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
- (清)徐繼畲，《瀛寰志略·凡例》，道光三十年刊本，臺北：華文書局，1968。
- (清)張德彝，《隨使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張德彝，《三述奇》，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合肥：黃山書社，2009。
- (清)陳蘭彬，《使美紀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二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曾紀澤，《曾惠敏公(紀澤)使西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 (清)鄒代鈞，《西征紀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劉瑞芬，《養雲山莊遺稿》，光緒十九年(1893)至二十二年(1896)刻本。
- (清)劉錫鴻，《英軺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繆祐孫，《俄遊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三帙》，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清)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臺北：華文書局，1968。

容閔，《西學東漸記》，臺北：廣文書局，1961。

專書

A. W. 恆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略》翻譯組譯，《清代名人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Frank Welsh 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于桂芬，《西風東漸——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

王豔秋、楊紀國，《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舉——1887 年海外遊歷使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李恩涵，《外交家曾紀澤：1839-1890》，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出版社，1993。

沈雲龍，《近代外交人物論評》，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68。

周佳榮，《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

侯勵英、周佳榮等，《閱讀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香港：香港圖書教育公司，2007。

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新北：左岸文化，2017。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陳國強主編，《文化人類學辭典》，臺北：恩楷出版社，2002。

彭淑敏等著，《香港第一》，香港：中華書局，2012。

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香港：中華書局，2011。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2016。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鍾叔河、楊堅整理，《走向世界叢書·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4。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航海述奇》，長沙：岳麓書社，1985。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乘槎筆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

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序論集》，長沙：岳麓書社，2002。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歐美環遊記》，長沙：岳麓書社，2008。

英文專書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期刊論文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臺北：2005)，頁 137-170。

專書論文

蕭國敏，〈《西洋雜誌》的編撰學：晚清士大夫首次走向西洋的集體敘述〉，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輯刊：第一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255-260。

張麗，〈20 世紀早期香港華人的職業構成及生活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193-213。

